

超越“多多益善”：利他程度对道德评价的影响及调节机制*

孙思捷 赵欢欢 皮 乔 张和云

(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 利他行为是一种有利于他人的积极行为, 但利他程度越高会被认为更道德吗? 本研究基于社会视角下的利他, 通过 7 个系列研究($N = 1798$)系统探讨了利他程度与道德评价之间的关系, 并深入揭示了其内部机制与边界条件。结果发现, 观察者对高度利他行为的道德评价反而低于中度利他行为, 教化功能感知起中介作用(研究 1a、1b); 通过“操纵中介作为调节”的设计, 为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作用提供了因果证据(研究 2a、2b); 自我不确定性调节了利他程度与教化功能感知之间的关系, 高自我不确定性会降低观察者对高度利他行为的教化功能感知, 进而降低道德评价(研究 3、4); 跨实验的内部元分析进一步支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研究 5)。本研究揭示了新时代背景下利他行为与道德评价之间的复杂关系: 利他行为并非“多多益善”, 高度利他可能适得其反, 深化了对利他行为为社会评价的理解, 并为推动社会和谐与道德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 利他行为, 道德评价, 教化功能, 自我不确定性

分类号 B849: C91

1 引言

“鲁国之法, 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 有能赎之者, 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 来而让, 不取其金。孔子曰: ‘赐失之矣。自今以往, 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 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 其人拜之以牛, 子路受之。孔子曰: ‘鲁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 观化远也。”
——《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篇》

利他行为是以提升他人福祉为根本动机的自愿行为(Pfattheicher et al., 2022), 核心在于为他人谋求利益。那么, 人们如何评价利他行为呢? 道德评价通常包括对行为本身的道德评价和对行为者道德品质的评价(Ho et al., 2019; Malle, 2021)。由此引出一个关键问题: 利他程度越高, 利他行为是否必然获得更高的道德评价? 直觉上, 利他程度的提

升似乎应同时提高对行为道德属性及行为者道德品质的评价。然而, 在“子贡赎人”的典故中, 孔子评价“赐失之矣”。从古汉语语境看, 这一评价既指子贡行为本身的不恰当, 也隐含对其道德修养尚未完美的指正。这表明, 利他行为与道德评价之间的关系可能比传统认识更为复杂。

为深入理解这一复杂关系, 有必要探讨影响利他行为道德评价的心理机制。孔子的观点提供了一种重要思路: 人们不仅关注行为的即时结果, 也重视其更长远社会示范效果。当代社会中, 公众热衷于探讨事件的社会价值与借鉴意义, 能产生良好示范的行为被认为更具道德性。教化功能反映某一行是否能够对他人未来的行为产生指导作用, 人们通过评估其示范价值来决定道德评价(Carnes et al., 2022)。《礼记》中“故礼之教化也微, 其止邪也于未形, 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的理念, 与现代道德心理学中强调道德应促进社会生活的

收稿日期: 2025-02-16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2CSH044)资助。

通信作者: 张和云, E-mail: zhangheyun@shnu.edu.cn

观点不谋而合(Ellemers et al., 2019; Tomasello, 2016), 也契合社会视角下的利他主义(societal perspective, Bykov, 2017), 即利他行为应促进社会集体福祉(Pfattheicher et al., 2022)。据此, 本研究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观察者对高度利他行为的道德评价较低, 可能源于其感知到该行为在社会示范价值上存在局限。

孔子所处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社会动荡的背景, 无疑影响了当时人们对子贡行为的评判。以往研究多聚焦利他者自身的动机或行为特征(Berman & Silver, 2022), 较少关注观察者自身的特点和心理因素。自我不确定性是个体在身份、信念、价值观、行为规范或归属感方面缺乏清晰和确定性的主观体验(Hogg, 2007, 2021), 其产生常受到外部事件和环境的影响, 如失业、社会变迁等(Hogg, 2021), 这意味着处于动荡环境中的个体更易产生较高的自我不确定性。时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地缘政治冲突、经济动荡等因素可能加剧个体的自我不确定性。那么, 高自我不确定性将如何影响观察者对高度利他行为的评价? 理解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从对行为的评价和对行为人的评价两个层面, 系统探讨人们对不同程度利他行为的道德评价。基于社会视角的利他主义, 提出观察者会依据高度利他行为的社会示范价值(即教化功能)进行评价, 且这一过程受自我不确定性的影响。本研究试图响应 Ellemers 等(2019)关于道德心理学未来研究应关注道德社会功能的倡议, 旨在为理解利他行为的道德评价机制提供新视角, 拓展该领域的理论研究维度, 深化对利他行为社会功能的认知, 并为现实中的道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

1.1 对高度利他行为的道德评价

利他行为旨在促进他人利益(Pfattheicher et al., 2022)。Kawamura 和 Kusumi (2020)在独裁者游戏中对其分类: 将全部资源分配给另一方的行为界定为高度利他行为, 其主体为高度利他者; 将一半资源分配给另一方的行为则为中度利他行为, 其主体为中度利他者。Berman 和 Silver (2022)进一步指出, 表现出高度慷慨、大量慈善捐赠或频繁参与亲社会行为的个体均可视为高度利他者。利他行为所涉资源不限于金钱, 也包括时间等(Macdonnell & White, 2015; Reed et al., 2016)。研究表明, 人们普遍认为时间捐赠比金钱捐赠在道德上更值得称赞(Johnson & Park, 2021)。但从资源消耗角度看, 金钱和时间同

为利他行为的关键资源, 二者在分配逻辑上具有概念共通性。在固定时长任务中, 利他者牺牲个人时间, 受助者获得等量自由时间, 实现“时间资源”的转移。为提升生态效度, 有必要检验研究结果在不同资源情境下的适用性。因此, 本研究将高度利他行为定义为: 当个体拥有资源(如金钱、时间)分配的主导权时, 将全部利益给予他人, 其行为主体为高度利他者; 中度利他行为则是将一半利益给予他人, 对应主体为中度利他者。研究证实, 高度利他行为被认为利他程度更高(Sun et al., 2025)。

道德评价是人们对行为正确性的判断及对行为主体的认同或不满(Ho et al., 2019; Malle, 2021)。直觉上, 利他程度越高, 人们对行为及行为者的评价理应越积极。然而, 研究发现, 尽管高度利他行为本身被视为更具道德性, 高度利他者却可能获得更低评价(Berry & Lucas, 2024)。观察者并不总是欣赏高度利他者(Bhagal et al., 2020; Tasimi et al., 2015), 他们可能质疑其道德品格(Bai et al., 2019; Bolderdijk et al., 2018), 怀疑其动机不纯(Berman & Silver, 2022), 或认为其行为难以预测(Sun et al., 2025), 进而给予较低道德评价。这种负面态度不仅影响道德判断(Bocian et al., 2018), 甚至可能引发针对高度利他者的“反社会惩罚”(陈璟 等, 2022; Pleasant & Barclay, 2018; Sun et al., 2023)。相较学界对“行为人”维度(观察者对利他者道德品质的评价)的关注, 以往研究较少系统探讨“行为”维度(高度利他行为本身是否更具道德性), 更缺乏对两维度内在关系的理论整合。这种单维度研究取向, 既限制了对道德评价多层次性的全面理解, 也难以解释已有研究中不一致、模糊甚至矛盾的结论。因此, 本研究引入对高度利他行为之行为道德性的考察, 旨在深化对利他行为与道德评价关系的理解, 推动对“行为-行为人”二维评价模式的整体把握, 为构建更整合的道德评价理论提供支持。

现有理论对高度利他行为与道德评价(包括行为道德性和行为人道德品质)的关系提供两种解释框架。结果主义道德观认为, 行为结果越积极, 该行为及其行为者就越应被视为道德(Miller, 2012), 据此高度利他行为与其行为者应获得更高评价。然而, 该观点难以解释高度利他者为何有时获得低评价(Berman & Silver, 2022)。以人为中心的道德观则强调行为人的内部状态(Uhlmann et al., 2015), 并提出道德评价中“行为-人”分离的可能(“act-person” dissociation)现象(Schwartz & Inbar, 2023), 即对行

为的评价基于结果好坏,而对行为人的评价则更多考量其内部状态。由此推测,高度利他行为或获更高评价,而高度利他者所得评价可能较低。然而,上述两种观点——不论是“行为与人一致高评”还是“行为高人低”的评价模式——均默认同一前提:利他程度越高,行为本身的道德评价就越高。但该前提是否必然成立尚待检验。初步证据显示,高度利他行为虽在利他程度上更高,但其道德性评价反而较低(Sun et al., 2025)。这一矛盾可从“倒U型”心理反应模式中获得理论启发:当刺激强度越过“最适区间”后,个体偏好会出现回落(Coombs & Avrunin, 1977; Grant & Schwartz, 2011)。道德评价亦可能遵循这一规律:当利他程度超越社会普遍接受的“适宜区间”后,反而触发观察者的负面评价,导致对行为及行为者评价的同步下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在“同时上升”和“行为-人分离”之外,还存在第三种可能:相较于中度利他行为,人们对高度利他行为及其行为者的道德评价均更低,即“行为-人一致性下降”的评价模式。

根据社会视角的利他主义,利他行为需符合社会价值与规范,而非仅出于善意或成本付出(Bykov, 2017)。因此,对利他行为的道德评价也应考量其社会功能。同一利他行为从不同视角审视可能效果迥异。这种对道德行为的深层次比较,体现了人们对多元化道德的思考,也揭示了道德评价本身的复杂性。间接证据表明,高度利他行为可能因偏离描述性规范或破坏合作公平而受到负面看待(孙倩, 2022; Kawamura & Kusumi, 2020)。综上,本研究推测,相较于中度利他行为,人们可能不仅认为高度利他行为本身的道德性更低,也对高度利他者的道德品质评价更低。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 1: 相比于中度利他行为,观察者对高度利他行为的道德评价(道德行为评价、道德品质感知)更低。

1.2 感知教化功能的中介作用

儒家思想强调个人德行的示范引导功能,《论语》倡导“择其善者而从之”,《诗经》提出“教以效化”,皆强调道德所具备的教化意义,主张通过树立具有社会价值的规范和榜样促进社会道德进步。这一理念与现代心理学中的“道德示范”及“同伴控制机制”(Tomasello, 2016)相契合,后者强调群体成员通过相互影响确立行为规范。儒家所推崇的“善”(傅佩荣, 2023)与道德合作理论(Curry, 2016; Curry et al., 2019)中“道德源于并服务于社会合作”

的主张相呼应,二者均注重从社会功能角度理解道德行为的意义。

功能多元主义模型指出,人类认知倾向于应对生活中的多种适应性挑战并形成相应的功能类型(Tetlock, 2002)。Carnes 等(2022)提出的道德认知社会功能模型将“教化功能”作为核心维度之一,即人们常将他人的行为视为应对社会问题的“可选解决方案”,并基于社会经验对其进行评估。社会价值较高的行为通常获得更高的道德评价,行为人也因此被认为更具道德修养。基于此,本研究将教化功能定义为:个体评估某一行为及其结果是否能够为他人的社会行为提供指导与规范。教化功能感知体现了个体对行为后果及示范效应的综合考量。现有研究表明,人们可能从多个角度认为高度利他行为具有相对消极的社会示范效果。

在合作层面,研究发现,与资源平均分配相比,前置任务中获得超半数资源的被试后续合作意愿更低(孙倩, 2022),提示高度利他行为可能损害合作意愿。当受助者将帮助视为对自身地位的威胁时,还可能对施助者“恩将仇报”(Tai et al., 2023),进一步阻碍合作。另有研究指出,过度慷慨易被怀疑存在“幻影成本”(phantom costs),认为其背后可能隐藏着欺骗(Vonasch et al., 2024),从而破坏合作信任。综上,高度利他行为可能对合作产生消极影响,故观察者可能认为其不适合作为指导社会交往的典范,即其教化功能较低。

在群体层面,尽管人们对利他行为评价总体积极(Kawamura & Kusumi, 2020),但道德表扬理论认为,表扬的重点在于建立社会关系(Anderson et al., 2020)。与道德谴责不同,观察者在进行道德表扬时更关注行为对人际关系的影响,而非仅看重其结果。高度利他行为会引发道德竞争(Pleasant & Barclay, 2018),观察者对高度利他者的人际印象评价较低(Kawamura & Kusumi, 2020);在择偶情境中,人们也更偏好中等水平的利他者(Bhagal et al., 2020)。故高度利他行为可能不利于群体和谐,导致观察者感知其教化功能较弱。

在价值层面,“尽责诚信”蕴含公正内涵,比“无私奉献”更贴近人们对“善”的理解(焦丽颖 等, 2022)。人们普遍秉持“做正确的事”的价值取向(Capraro et al., 2021),成人与幼儿均更偏好公平价值(Meng & Moriguchi, 2021; Tasimi et al., 2015)。社会交往中,平等主义原则被广泛遵循:人们偏好平等分配,反对接受过多资源,甚至会惩罚违反平等

规范者(Dawes et al., 2007)。但高度利他的分配方式与公平分配原则相差甚远(孙倩, 2022), 可能被认为违背公正价值。故尽管高度利他行为付出更多, 但因与普遍持有的公平价值观相悖, 观察者可能认为其在价值层面存在争议, 进而降低对其教化功能的评价。

综上, 高度利他行为不仅可能损害合作, 阻碍群体和谐, 还可能偏离普遍认同的公平价值观, 故相较于中度利他行为, 人们更可能认为其社会价值较低。这种认知易使观察者将其视为“不具示范意义的问题解决方案”, 而高度利他者则被视为“做出不良示范的人”, 这与同伴控制机制(Tomasello, 2016)相符——对行为的约束本质上亦是对行为人的约束。这种负面评价不仅会降低对高度利他行为的道德评价, 也会削弱对高度利他行为者道德品质的感知。因此, 本文提出:

假设 2: 观察者对利他行为的教化功能感知在利他程度和道德评价之间起中介作用。

1.3 自我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自我不确定性是指个体在自我概念、价值观、归属感及行为规范等方面感受到的模糊与缺乏清晰感的心理状态(Hogg, 2007, 2021)。不确定性认同理论认为, 自我概念是其核心问题(Hogg, 2009), 且该状态具有环境敏感性, 个体在社会、情境和结构性环境中体验和发展自我不确定性(Hogg, 2021)。从结构上, 其可分为特质性与状态性两类(杨庆等, 2017; Choi & Hogg, 2020): 状态自我不确定性由特定事件或情境引发, 是暂时性的自我不确定体验(Hogg, 2021; Pfattheicher & Böhm, 2018), 可通过回忆法等方式启动(Choi & Hogg, 2020); 而特质自我不确定性则是个体长期稳定的自我概念模糊倾向, 由持续的外部事件(如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塑造(Hogg, 2021), 被认为在心理上更具深度与真实性(Choi & Hogg, 2020), 常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测量进行评估(Chung & Saini, 2022; Noguti & Bokeyar, 2014)。研究表明, 自我不确定性会显著影响个体的认知与判断(吴莹, 2021; 杨庆等, 2017; Hogg, 2009, 2021)。

在合作层面, 自我不确定性会削弱个体的合作意愿。其与不安全感高度密切相关, 易使个体转向自我保护并更关注风险, 表现为目光短浅与跨期决策能力下降(Wu et al., 2022)。降低人际信任是应对不确定性的常见策略, 即便诚实谦逊的个体在自我不确定状态下也会显著降低对他人的信任

(Pfattheicher & Böhm, 2018), 这可能源于自我保护动机——高自我不确定性的个体更容易相信阴谋论(Hogg, 2021)。因此, 高自我不确定的个体亲社会倾向与人际信任基础易被动摇, 从而更可能放大高度利他行为的潜在风险, 降低对其教化功能的评价。

在群体层面, 根据不确定感-认同理论, 个体常通过参考群体标准应对不确定感(Hogg, 2021)。高自我不确定性个体从众倾向更强, 更依赖外部信息与他人行为模式以增强决策确定感, 规避因自我单独决策失败可能引发的自我怀疑(吴莹, 2021; Choi & Hogg, 2020; Hogg, 2009, 2021)。评估利他行为的教化功能时, 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常见的中度利他行为, 而高度利他行为因其稀有性与规范偏离性(Kawamura & Kusumi, 2020; Klein & Epley, 2014), 被视为不符合群体标准, 故获得较低的教化功能评价。

在价值层面, 不确定性管理视角(Van den Bos, 2009)指出, 自我不确定性会激活个体的价值观防御机制, 使其对社会公正更敏感。高自我不确定性个体往往更极端地捍卫自身价值观(Hogg, 2021), 倾向于支持符合其价值观的事件, 强烈排斥违背价值观的行为(Van den Bos, 2009), 且对情境中的公正信息反应更强烈(De Cremer & Sedikides, 2009)。在此背景下, 符合公正期望的中度利他行为更易被接受, 并被认为具有较高的社会示范价值; 而高度利他行为则可能因偏离公正原则而被视为示范价值较低。故自我不确定性可能作为一种价值观过滤机制, 削弱人们对高度利他行为教化功能的感知, 并赋予其较低的价值权重。

综上, 高自我不确定性会抑制个体的亲社会倾向, 增强其对多数人行为的参照依赖, 并强化对公正价值的偏好, 从而降低对高度利他行为教化功能的感知。因此, 本文提出:

假设 3: 观察者的自我不确定性在利他程度与教化功能感知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即高自我不确定性会加剧对高度利他行为的低教化功能感知, 而低自我不确定性则会减弱该效应。

假设 4: 观察者的自我不确定性通过调节利他程度和教化功能感知的关系, 进而对利他程度和道德评价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

1.4 研究概览

综上所述, 本研究拟通过 7 个研究系统探索利他行为和道德评价的关系, 并揭示其内在机制与调

节因素(见图1)。为提升生态效度,本研究同时考察金钱情境和时间情境两种资源背景下的利他行为。研究推测,在上述两种情境中,观察者均会给予高度利他者较低的道德评价,其中教化功能感知发挥中介作用,而自我不确定性起调节作用。为验证该理论框架,研究采用多方法验证体系:研究1a和1b分别基于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情境,初步探讨不同利他程度和道德评价之间的关系,并考察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机制;研究2a和2b采用“操纵中介作为调节”设计(a manipulation-of-mediation-as-a-moderator design, MMM design),通过直接操纵教化功能,为其中介效应提供因果证据;研究3通过问卷测量特质自我不确定性,考察其调节作用;研究4则通过回忆启动范式操纵状态自我不确定性,检验其在利他程度与道德评价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研究5通过跨实验的内部元分析,进一步检验研究结论的一致性与稳健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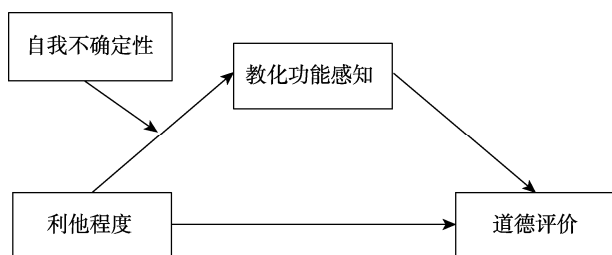


图1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2 研究1a 金钱成本利他程度和道德评价: 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作用

2.1 研究目的

研究1a旨在初步检验观察者对高度利他者的道德评价较低的现象,以及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假设,与中度利他行为者相比,观察者对高度利他行为者的道德行为评价和道德品质感知均会降低,且均由感知教化功能中介。

2.2 被试

根据Kawamura和Kusumi(2020)中利他程度与声誉评价的关系,计算得到主效应的效应量 $f = 0.31$ 。鉴于该研究与本研究在变量及操纵上并非完全同构,且中介效应通常比主效应更难检测(Fritz & MacKinnon, 2007),易受到测量误差和模型设定等因素影响,本研究采用更保守的样本量估算策略。根据G*power 3.1的计算,采用中等效应量($f = 0.25$),要达到0.95的统计效力,每个条件至少需要

105人,一共需要210人。本研究通过线上问卷系统面向全国招募320名参与者,剔除48名没有通过注意力检测项目的被试,最终有效样本量为272人,有效率为85.00%。其中,男性109人(40.10%),女性163人(59.90%),平均年龄32.47岁($SD = 11.08$),年龄范围为18~72岁。

被试被随机分为两组:中度利他者组145人(53.31%),其阅读情境中的主人公为中度利他者,将一半奖金分配给另一位中奖者;高度利他者组127人(46.69%),其阅读情境中的主人公为高度利他者,将全部奖金分配给另一位中奖者。

2.3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利他程度(中度利他、高度利他),因变量为道德评价(道德行为评价、道德品质感知),中介变量为教化功能感知。

2.4 实验程序

首先,将被试随机分配到中度利他组或高度利他组,每组被试分别阅读与组别对应的利他行为情境材料。阅读完成后,被试需依次对故事中主人公行为的教化功能、行为道德性及其道德品质进行评价。

2.5 实验材料

2.5.1 利他情境材料

本研究采用改编自Kawamura和Kusumi(2020)的独裁者游戏情境,通过日常场景呈现高度与中度利他行为。尽管高度利他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出现频率相对较低,但仍存在广泛认可的现实原型(例如,“子贡赎人”分文不取、雷锋无私奉献、全额捐赠奖金等),且被试能够有效区分不同行为的利他程度(Sun et al., 2025)。沿用该材料也有助于保持与既有研究的可比性和连续性。

被试阅读一个“抽奖分配”情境,描述中奖者X对奖金的不同分配方式:中度利他条件下,X将奖金平分;高度利他条件下,X将奖金全部给予另一人(详见网络版附录)。

2.5.2 测量变量

本研究测量了教化功能感知、行为道德性评价和道德品质感知。所有量表均采用Likert 7点计分(1 = 极其低, 7 = 极其高),要求被试根据同意程度评分,得分越高表示相应感知或评价的水平越高。教化功能感知改编自Carnes等(2022),共4个项目(例如,“你认为人们可以学习X的行为”), $\alpha = 0.91$;行为道德性评价改编自Carnes等(2022),共3个项

目(例如,“你觉得 X 的行为的道德程度”), $\alpha = 0.59$; 道德品质感知改编自 Carnes 等(2022)和 Ashton 和 Lee (2009), 共 5 个项目(例如,“你觉得 X 的道德程度”), $\alpha = 0.59$ 。

2.6 结果

2.6.1 描述性统计

表 1 呈现了各变量间的相关矩阵, 对角线的下半部分为中度利他组, 对角线的上半部分为高度利他组。结果显示, 两组中观察者对利他行为道德性的评价和对行为人道德品质的感知均呈显著正相关。

表 1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变量	1	2	3	4	5
1. 性别	—	-0.001	-0.17	-0.26**	-0.21*
2. 年龄	0.12	—	0.31***	0.29***	0.23*
3. 教化功能	-0.11	0.07	—	0.79***	0.73***
4. 行为道德性	0.20	0.06	0.50***	—	0.63***
5. 道德品质	-0.01	0.11	0.56***	0.70***	—

注: $N = 272$ 。性别为虚拟变量 0 = 男, 1 = 女;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2.6.2 利他程度对教化功能和道德评价的影响

对教化功能感知、行为道德性评价和行为人道德品质感知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见图 2), 自变量为利他程度(中度利他、高度利他)。结果显示, 高度利他组($M = 5.13$, $SD = 1.53$)的教化功能感知显著低于中度利他组($M = 5.75$, $SD = 0.90$), $F(1, 270) = 16.95$, $p < 0.001$, $\eta_p^2 = 0.06$; 高度利他组($M = 5.68$, $SD = 0.98$)的行为道德性评价亦显著低于中度利他组($M = 6.08$, $SD = 0.59$), $F(1, 270) = 17.49$, $p < 0.001$, $\eta_p^2 = 0.06$; 高度利他组($M = 5.66$, $SD = 0.56$)的道德品质感知同样显著低于中度利他组($M = 5.91$, $SD = 0.82$), $F(1, 270) = 8.84$, $p = 0.003$, $\eta_p^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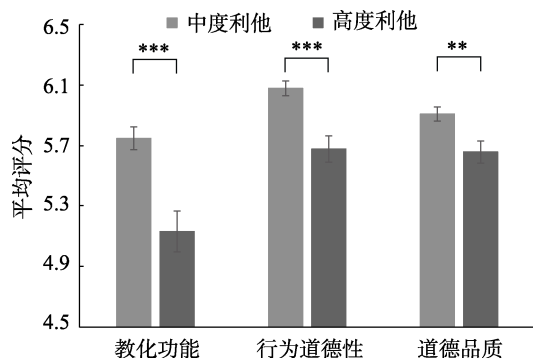


图 2 利他程度在各因变量评分上的差异
注: 误差条表示标准误; ** $p < 0.01$, *** $p < 0.001$ 。

0.03。结果表明, 高度利他组在三项指标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中度利他组。

2.6.3 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作用

研究采用 PROCESS 宏程序模型 4 检验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作用(Hayes, 2013)。控制性别和年龄后, 以利他程度(中度利他组 = 0, 高度利他组 = 1)为自变量, 教化功能感知为中介变量, 分别以行为道德性评价和道德品质感知为因变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利他程度显著负向预测行为道德性评价($b = -0.47$, $p < 0.001$), 支持假设 1。利他程度负向预测教化功能感知($b = -0.47$, $p < 0.001$), 教化功能感知正向预测行为道德性评价($b = 0.69$, $p < 0.001$), 利他程度对行为道德性评价的直接效应不显著($b = -0.15$, $p = 0.079$), 利他程度对行为道德性评价的间接效应显著($b_{indirect} = -0.32$, $SE = 0.10$, 95% CI = [-0.53, -0.15]); 利他程度显著负向预测道德品质感知($b = -0.34$, $p = 0.004$), 支持假设 1。利他程度负向预测教化功能感知($b = -0.47$, $p < 0.001$), 教化功能感知正向预测道德品质感知($b = 0.67$, $p < 0.001$), 利他程度对道德品质感知的直接效应不显著($b = -0.03$, $p = 0.773$), 利他程度对道德品质感知的间接效应显著($b_{indirect} = -0.31$, $SE = 0.09$, 95% CI = [-0.49, -0.15])。综上, 教化功能感知在利他程度对道德评价(行为、行为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支持假设 2。

2.7 讨论

研究 1a 考察了利他程度对行为道德性评价与道德品质感知的影响, 并检验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 相较于中度利他行为, 观察者对高度利他行为的道德评价更低, 这一差异同时体现在行为本身的道德性评价与行为人的道德品质感知两方面, 支持假设 1, 与既有研究一致(Kawamura & Kusumi, 2020)。教化功能感知在利他程度与道德评价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 假设 2 亦获支持。此外, 行为道德性评价与行为人道德品质感知呈高度正相关, 印证了社会视角下利他主义的理论预期, 表明个体在道德评价中对行为与行为人的判断具有一致性。

3 研究 1b 时间成本利他程度和道德评价: 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作用

3.1 研究目的

研究 1b 将采用基于时间成本的实验材料, 进一步检验对高度利他者道德评价较低的现象, 并考

察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作用。已有研究表明,在亲社会行为中,人们可能认为时间付出比金钱付出更昂贵(Johnson & Park, 2021)。据此,本研究假设,在基于时间成本的利他行为情境下,利他程度仍负向预测道德评价。

3.2 被试

样本量估算方法同研究 1a。本研究通过线上问卷系统面向全国招募 320 名参与者,剔除 24 名没有通过注意力检测项目的被试,最终有效样本量为 296 人,有效率为 92.50%。其中,男性 105 人(35.50%),女性 191 人(64.50%),平均年龄 31.19 岁($SD=10.78$),年龄范围为 17~69 岁。

被试被随机分为两组:中度利他者组 147 人(49.7%),其阅读情境中的主人公为中度利他者,帮助另一位志愿者完成了一半的工作;高度利他者组 149 人(50.3%),其阅读情境中的主人公为高度利他者,帮助另一位志愿者完成了全部的工作。

3.3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利他程度(中度利他、高度利他),因变量为道德评价(分成道德行为评价和道德品质感知),中介变量为教化功能感知。

3.4 实验程序

同研究 1a。

3.5 实验材料

3.5.1 利他情境材料

本研究实验情境改编自 Kawamura 与 Kusumi (2020)的研究范式。在研究 1a 基础上,采用时间成本背景,以检验研究结论在不同背景下的稳健性并提升生态效度。

被试阅读一个“任务分配”情境,描述参与者 X 需与另一人分配枯燥的文稿校对任务:中度利他条件下, X 将任务量平分;在高度利他条件下, X 则承担全部任务(详见网络版附录)。

3.5.2 测量变量

本研究对教化功能感知($\alpha=0.92$)、行为道德性评价($\alpha=0.88$)及道德品质感知进行测量,其中道德品质感知改编自 Carnes 等(2022),共 7 个项目(例如,“你觉得 X 的道德程度”), $\alpha=0.94$ 。教化功能感知和行为道德性评价的测量方式均同研究 1a。

3.6 结果

3.6.1 描述性统计

表 2 呈现了各变量间的相关矩阵,对角线的下半

部分为中度利他组,对角线的上半部分为高度利他组。结果显示,两组中观察者对利他行为道德性的评价和对行为人道德品质的感知均呈显著正相关。

表 2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变量	1	2	3	4	5
1. 性别	—	0.04	-0.04	-0.13	-0.10
2. 年龄	-0.09	—	0.16	0.09	0.003
3. 教化功能	0.07	0.23**	—	0.74***	0.62***
4. 行为道德性	0.03	0.12	0.79***	—	0.86***
5. 道德品质	0.06	0.12	0.81***	0.87***	—

注: $N=296$ 。性别为虚拟变量 0 = 男, 1 = 女; ** $p < 0.01$, *** $p < 0.001$ 。

3.6.2 利他程度对教化功能和道德评价的影响

对教化功能感知、行为道德性评价和道德品质感知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见图 3),自变量为利他程度(中度利他、高度利他)。结果显示,高度利他组($M=4.37$, $SD=1.59$)的教化功能感知显著低于中度利他组($M=5.61$, $SD=1.09$), $F(1, 294)=60.62$, $p < 0.001$, $\eta_p^2=0.17$;高度利他组($M=4.84$, $SD=1.61$)的行为道德性评价亦显著低于中度利他组($M=5.66$, $SD=1.07$), $F(1, 294)=26.48$, $p < 0.001$, $\eta_p^2=0.08$;高度利他组($M=5.20$, $SD=1.47$)的道德品质感知同样显著低于中度利他组($M=5.64$, $SD=0.97$), $F(1, 294)=9.32$, $p=0.002$, $\eta_p^2=0.03$ 。结果表明,高度利他组在三项指标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中度利他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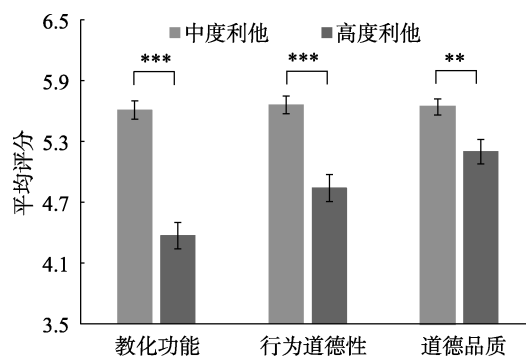


图 3 利他程度在各因变量评分上的差异

注: 误差条表示标准误; ** $p < 0.01$, *** $p < 0.001$ 。

3.6.3 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作用

研究采用 PROCESS 宏程序模型 4 检验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作用(Hayes, 2013)。控制性别和年龄后,以利他程度(中度利他组 = 0, 高度利他组 = 1)为自变量,教化功能感知为中介变量,分别以行为道德性评价和道德品质感知为因变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利他程度显著负向预测行为道德性评价($b =$

-0.56, $p < 0.001$), 支持假设 1。利他程度负向预测教化功能感知($b = -0.78, p < 0.001$), 教化功能感知正向预测行为道德性评价($b = 0.80, p < 0.001$), 利他程度对行为道德性评价的直接效应不显著($b = 0.07, p = 0.385$), 利他程度对行为道德性评价的间接效应显著($b_{indirect} = -0.63, SE = 0.09, 95\% CI = [-0.82, -0.44]$); 利他程度显著负向预测道德品质感知($b = -0.34, p = 0.003$), 支持假设 1。利他程度负向预测教化功能感知($b = -0.78, p < 0.001$), 教化功能感知正向预测道德品质感知($b = 0.74, p < 0.001$), 利他程度对道德品质感知的直接效应显著($b = 0.24, p = 0.010$), 利他程度对道德品质感知的间接效应显著($b_{indirect} = -0.58, SE = 0.09, 95\% CI = [-0.78, -0.41]$)。综上, 教化功能感知在利他程度对道德评价(行为、行为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支持假设 2。

3.7 讨论

研究 1b 在时间成本情境复现了研究 1a 的结果: 相较于中度利他, 高度利他获得更低的道德评价, 教化功能感知发挥显著中介作用。对行为与行为者的评价仍呈正相关, 显示两者的一致性。尽管付出时间常被视为比金钱更昂贵(Johnson & Park, 2021), 但时间情境下仍再次验证假设 1 和假设 2, 表明该效应具有跨情境稳健性, 为理解利他行为的社会认知机制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实证基础。

4 研究 2a 不同教化功能感知对金钱成本利他行为道德评价的影响

4.1 研究目的

研究 2a 将采用金钱成本情境, 通过“操纵中介作为调节”(MMM)设计, 即直接操纵教化功能感知, 进一步探究其在利他程度和道德评价之间的中介作用, 以提供因果证据。根据 Ge (2023) 提出的验证标准, 中介效应成立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1) 所操纵的中介变量在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2) 自变量和所操纵的中介变量的交互项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 (3) 控制组的中介模型成立。本研究假设, 研究结果将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条件。

4.2 被试

基于研究 1a 和 1b 的结果, 利他程度和道德评价主效应的效应量分别为 $f = 0.25$ 和 $f = 0.30$ 。考虑到调节效应通常比主效应更难检测(Aguinis et al., 2005), 且本研究采用较新的实验启动方式, 为提高结果稳健性, 在招募被试时适当扩大了样本量

(Zhao & Biernat, 2022)。根据 G*power 3.1 的计算, 采用中效应量($f = 0.25$), 为达到 0.95 的统计效力, 每个条件至少需要 40 人, 一共需要 251 人。本研究通过线上问卷系统面向全国招募 320 名参与者, 剔除 7 名没有通过注意力检测项目的被试, 最终有效样本量为 313 人, 有效率为 97.81%。其中, 男性 94 人(30.00%), 女性 219 人(70.00%), 平均年龄 30.93 岁($SD = 8.56$), 年龄范围为 18~56 岁。

被试被随机分为 6 组: 中度利他-低教化功能组 53 人, 中度利他-控制组 52 人, 中度利他-高教化功能组 53 人; 高度利他-低教化功能组 53 人, 高度利他-控制组 52 人, 高度利他-高教化功能组 50 人。

4.3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 2 (利他程度: 中度利他、高度利他) $\times$ 3 (教化功能操纵: 低教化功能组、控制组、高教化功能组) 的两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 因变量为道德评价(分成道德行为评价和道德品质感知)。

4.4 实验程序

首先, 被试被随机分配至中度或高度利他组, 阅读相应情境材料; 随后, 被试被再次随机分配至低教化功能组、高教化功能组或控制组, 完成对应的启动任务, 并回答教化功能感知的启动检验问题。最后, 被试对故事主人公的行为道德性及道德品质进行评价。

4.5 实验材料

4.5.1 利他情境材料

由于研究 1a 中因变量的测量信度较低, 故本研究对实验材料进行优化, 进一步明确强调主人公对金钱拥有绝对的分配权, 以减少被试在理解任务时可能出现的歧义(详见网络版附录)。

4.5.2 教化功能操纵

本实验的启动范式改编自 Carnes 等(2022)的研究, 将被试分成三组, 即低教化功能组、高教化功能组或控制组, 通过指导语启动被试的不同状态(详见网络版附录)。

4.5.3 操作检验与测量项目

操作检验及主要测量项目均沿用研究 1a 的相关内容。其中, 教化功能的操作检验使用 4 个教化功能感知题目, $\alpha = 0.91$; 行为道德性评价共 3 个项目, $\alpha = 0.89$; 道德品质感知共 5 个项目, $\alpha = 0.85$ 。

4.6 结果

4.6.1 教化功能感知的差异检验

如表 3 所示, 低教化功能组、高教化功能组和控制组的教化功能感知分数存在显著差异, 低教化

功能组显著低于控制组($t = -8.12, p < 0.001$, Cohen's $d = -1.12$), 亦低于高教化功能组($t = -14.98, p < 0.001$, Cohen's $d = -2.07$), 控制组也显著低于高教化功能组($t = -4.40, p < 0.001$, Cohen's $d = -0.61$)。结果表明, 对教化功能感知的操纵有效, 满足“MMM”设计的检验条件(1)。

4.6.2 利他程度和教化功能感知的交互作用对道德评价的影响

对行为道德性评价和行为人道德品质感知进行 2 (利他程度: 中度利他、高度利他) $\times$ 3 (教化功能操纵: 低教化功能组、控制组、高教化功能组) 的被试间方差分析。

行为道德性评价(见图 4a): 利他程度主效应显著, $F(1, 307) = 8.38, p = 0.004, \eta_p^2 = 0.03$, 高度利他组评分($M = 5.02, SD = 1.62$)显著低于中度利他组($M = 5.41, SD = 1.59$); 教化功能主效应显著, $F(2, 307) = 117.08, p < 0.001, \eta_p^2 = 0.43$, 低教化功能组评分($M = 3.78, SD = 1.43$)显著低于控制组($M = 5.73, SD = 1.33, t = -10.26, p < 0.001$, Cohen's $d = -1.42$)与高教化功能组($M = 6.14, SD = 0.87, t = -14.38, p < 0.001$, Cohen's $d = -1.99$), 控制组亦显著低于高教化功能组, $t = -2.64, p = 0.009$, Cohen's

$d = -0.37$; 利他程度和教化功能的交互作用显著, $F(2, 307) = 8.26, p < 0.001, \eta_p^2 = 0.05$ 。简单效应分析显示, 在低教化功能组, 高度利他组($M = 3.92, SD = 1.50$)和中度利他组($M = 3.63, SD = 1.37$)评分差异不显著, $F(1, 307) = 1.62, p = 0.204$; 在控制组, 高度利他组评分($M = 5.21, SD = 1.60$)显著低于中度利他组($M = 6.25, SD = 0.67$), $F(1, 307) = 19.83, p < 0.001, \eta_p^2 = 0.06$; 在高教化功能组, 高度利他组($M = 5.93, SD = 1.01$)和中度利他组($M = 6.35, SD = 0.67$)差异不显著, $F(1, 307) = 3.25, p = 0.072$ 。

行为人道德品质感知(见图 4b): 利他程度主效应显著, $F(1, 307) = 11.58, p < 0.001, \eta_p^2 = 0.04$, 高度利他组评分($M = 5.09, SD = 1.18$)显著低于中度利他组($M = 5.45, SD = 1.12$); 教化功能主效应显著, $F(2, 310) = 79.33, p < 0.001, \eta_p^2 = 0.34$, 低教化功能组评分($M = 4.35, SD = 1.14$)显著低于控制组($M = 5.60, SD = 0.95, t = -8.64, p < 0.001$, Cohen's $d = -1.19$)和高教化功能组($M = 5.85, SD = 0.72, t = -11.36, p < 0.001$, Cohen's $d = -1.57$), 控制组亦显著低于高教化功能组, $t = -2.13, p = 0.034$, Cohen's $d = -0.30$; 利他程度和教化功能的交互作用显著, $F(2, 307) = 5.80, p = 0.003, \eta_p^2 = 0.04$ 。简单效应分

表 3 教化功能感知的操作检验结果

变量	低教化功能组	控制组	高教化功能组	F	η_p^2
中度利他组	3.30 $\pm$ 1.20	5.65 $\pm$ 0.95	5.94 $\pm$ 0.69	73.57***	0.32
高度利他组	3.40 $\pm$ 1.49	4.28 $\pm$ 1.70	5.52 $\pm$ 1.06	38.58***	0.20
总计	3.35 $\pm$ 1.35	4.96 $\pm$ 1.53	5.74 $\pm$ 0.91	102.70***	0.40

注: $N = 313$. *** $p < 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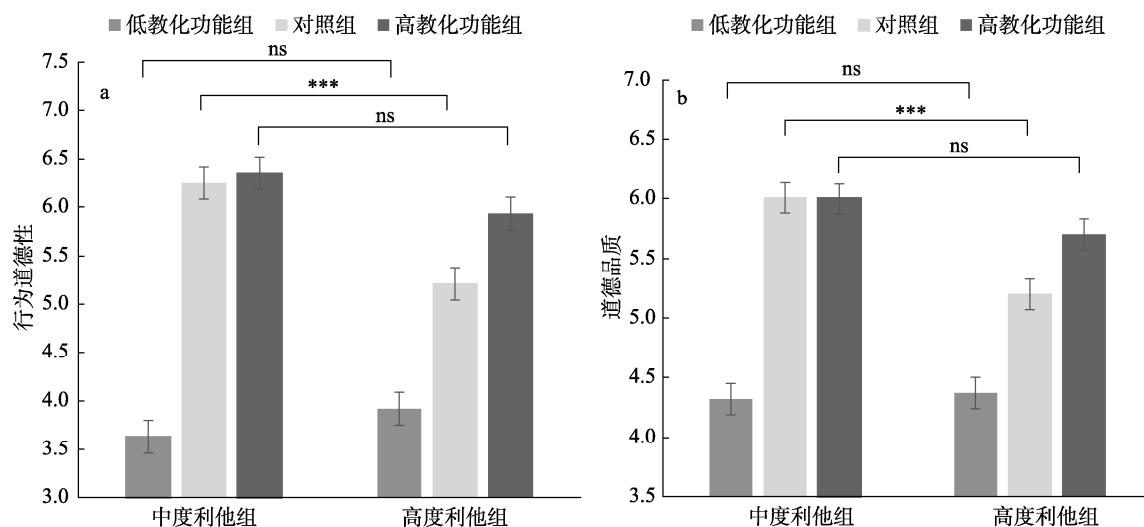


图 4 利他程度和教化功能在行为道德性和道德品质上的差异

注: 误差条表示标准误; *** $p < 0.001$, ns = not significant.

析显示,在低教化功能组,高度利他组($M = 4.37$, $SD = 1.15$)和中度利他组($M = 4.32$, $SD = 1.15$)评分差异不显著, $F(1, 307) = 0.09$, $p = 0.770$; 在控制组,高度利他组($M = 5.20$, $SD = 1.13$)显著低于中度利他组($M = 6.01$, $SD = 0.46$), $F(1, 307) = 20.10$, $p < 0.001$, $\eta_p^2 = 0.06$; 在高教化功能组,高度利他组($M = 5.70$, $SD = 0.84$)和中度利他组($M = 6.00$, $SD = 0.55$)差异不显著, $F(1, 307) = 2.83$, $p = 0.093$ 。

采用 PROCESS 宏程序模型 1 进一步检验自变量和所操纵的中介变量的交互项对因变量的影响(Hayes, 2013)。控制性别和年龄后,以利他程度(中度利他组 = 0, 高度利他组 = 1)为自变量,教化功能为调节变量,行为道德性评价和道德品质感知为因变量进行分析。

以低教化功能组为调节变量(控制组 = 0, 低教化功能组 = 1),利他程度和教化功能的交互项对行为道德性评价($b = 0.84$, $SE = 0.23$, $p < 0.001$, $95\% \text{ CI} = [0.39, 1.29]$)和行为人道德品质感知($b = 0.76$, $SE = 0.17$, $p = 0.002$, $95\% \text{ CI} = [0.28, 1.23]$)均显著。简单斜率检验(见图 5a-5b)显示,在控制组,利他程度显著负向预测行为道德性评价($b_{\text{simple}} =$

-0.64 , $SE = 0.16$, $p < 0.001$, $95\% \text{ CI} = [-0.96, -0.32]$)和行为人道德品质感知($b_{\text{simple}} = -0.70$, $SE = 0.17$, $p < 0.001$, $95\% \text{ CI} = [-1.03, -0.36]$); 在低教化功能组,利他程度对行为道德性评价($b_{\text{simple}} = 0.20$, $SE = 0.16$, $p = 0.216$, $95\% \text{ CI} = [-0.12, 0.52]$)和行为人道德品质感知($b_{\text{simple}} = 0.06$, $SE = 0.17$, $p = 0.716$, $95\% \text{ CI} = [-0.27, 0.40]$)的预测均不显著。

以高教化功能组为调节变量(控制组 = 0, 高教化功能组 = 1),利他程度和教化功能的交互项对行为道德性评价($b = 0.38$, $SE = 0.18$, $p = 0.039$, $95\% \text{ CI} = [0.02, 0.74]$)和行为人道德品质感知($b = 0.43$, $SE = 0.19$, $p = 0.024$, $95\% \text{ CI} = [0.06, 0.81]$)均显著。简单斜率检验(见图 5c-5d)显示,在控制组,利他程度显著负向预测行为道德性评价($b_{\text{simple}} = -0.65$, $SE = 0.13$, $p < 0.001$, $95\% \text{ CI} = [-0.90, -0.39]$)和行为人道德品质感知($b_{\text{simple}} = -0.70$, $SE = 0.13$, $p < 0.001$, $95\% \text{ CI} = [-0.97, -0.44]$); 在高教化功能组,利他程度对行为道德性($b_{\text{simple}} = -0.27$, $SE = 0.13$, $p = 0.040$, $95\% \text{ CI} = [-0.52, -0.01]$)和行为人道德品质感知($b_{\text{simple}} = -0.27$, $SE = 0.13$, $p = 0.049$, $95\% \text{ CI} = [-0.53, -0.002]$)的预测作用减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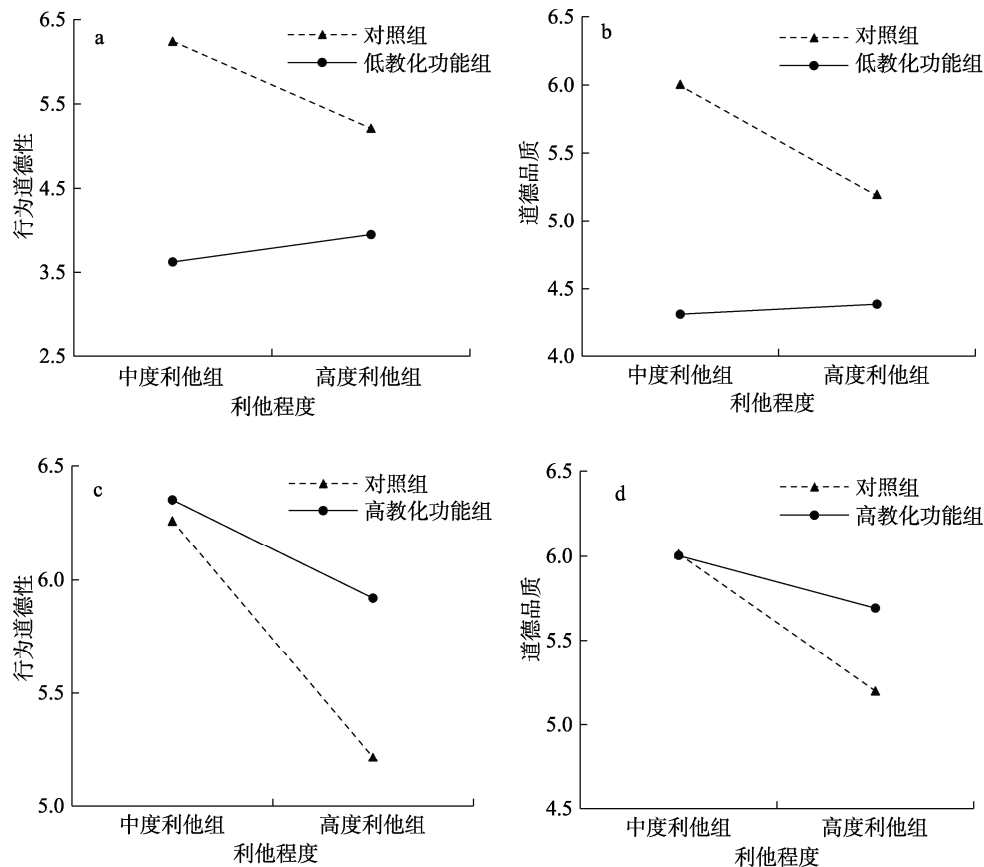


图 5 教化功能对利他程度和道德评价的调节作用

综上, 利他程度和所操纵的教化功能感知的交互项对道德评价(行为、行为人)均有显著影响, 满足“MMM”设计的检验条件(2)。

4.6.3 控制组中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 PROCESS 宏程序模型 4 检验控制组中教化功能感知是否在利他程度和道德评价之间起到中介作用(Hayes, 2013)。控制性别和年龄后, 以利他程度(中度利他组 = 0, 高度利他组 = 1)为自变量, 教化功能感知为中介变量, 分别以行为道德性评价和道德品质感知为因变量进行分析。

利他程度显著负向预测行为道德性评价($b = -0.64, p < 0.001$); 利他程度负向预测教化功能感知($b = -0.85, p < 0.001$), 教化功能感知正向预测行为道德性评价($b = 0.63, p < 0.001$), 利他程度对行为道德性评价的直接效应不显著($b = -0.11, p = 0.361$), 利他程度对行为道德性评价的间接效应显著($b_{indirect} = -0.53, SE = 0.12, 95\% CI = [-0.78, -0.30]$)。结果表明, 在利他程度对行为道德性评价的影响中, 教化功能感知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利他程度显著负向预测道德品质感知($b = -0.70, p < 0.001$); 利他程度负向预测教化功能感知($b = -0.84, p < 0.001$), 教化功能感知正向预测道德品质感知($b = 0.59, p < 0.001$), 利他程度对道德品质感知的直接效应不显著($b = -0.20, p = 0.111$), 利他程度对道德品质感知的间接效应显著($b_{indirect} = -0.50, SE = 0.13, 95\% CI = [-0.76, -0.27]$)。结果表明, 在利他程度对行为道德品质感知的影响中, 教化功能感知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综上, 结果表明, 控制组内的中介模型成立, 满足“MMM”设计的检验条件(3)。

4.7 讨论

研究 2a 通过“MMM”方法为教化功能感知在利他程度与道德评价之间的中介作用提供了因果证据。研究结果同时满足了三个条件(Ge, 2023): (1) 所操纵的教化功能感知在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2) 利他程度和所操纵的教化功能感知的交互项对道德评价有显著影响; (3) 控制组中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效应成立。结果表明, 改变教化功能感知会影响观察者对利他者的道德评价。

5 研究 2b 不同教化功能感知对时间成本利他行为道德评价的影响

5.1 研究目的

研究 2b 将在时间成本背景下, 通过“MMM”设

计再次探究教化功能感知在利他程度和道德评价之间的因果证据。

5.2 被试

样本量估算方法同研究 2a。本研究通过线上问卷系统面向全国招募 400 名参与者, 剔除 13 名没有通过注意力检测项目的被试, 最终有效样本量为 377 人, 有效率为 94.25%。其中, 男性 103 人(27.32%), 女性 274 人(72.68%), 平均年龄 31.24 岁($SD = 8.70$), 年龄范围为 18~76 岁。

被试被随机分为 6 组: 中度利他-低教化功能组 64 人, 中度利他-控制组 66 人, 中度利他-高教化功能组 62 人; 高度利他-低教化功能组 61 人, 高度利他-控制组 61 人, 高度利他-高教化功能组 63 人。

5.3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 2 (利他程度: 中度利他、高度利他) $\times$ 3 (教化功能操纵: 低教化功能组、控制组、高教化功能组) 的两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 因变量为道德评价(分成道德行为评价和道德品质感知)。

5.4 实验程序

同研究 2a。

5.5 实验材料

5.5.1 利他情境材料

在研究 1b 基础上优化实验情境, 明确强调总任务时长保持不变, 且任务分配后不能两人同时完成, 以减少被试可能产生的理解歧义(如误认为任务分配后效率会提升, 详见网络版附录)。

5.5.2 教化功能操纵

本实验的启动范式改编自 Carnes 等(2022)的研究, 把被试随机分成三组, 即低教化功能组、高教化功能组或控制组, 通过指导语启动被试的不同状态(详见网络版附录)。

5.5.3 操作检验与测量项目

操作检验及主要测量项目均沿用前述研究的相关项目。教化功能的操作检验使用研究 1b 中测量教化功能感知的 4 个项目, $\alpha = 0.90$; 行为道德性评价测量同研究 1a, $\alpha = 0.86$; 道德品质感知测量同研究 1b, $\alpha = 0.90$ 。

5.6 结果

5.6.1 教化功能感知的差异检验

如表 4 所示, 低教化功能组、高教化功能组和控制组的操纵检验项目分数存在显著差异, 低教化功能组显著低于控制组($t = -10.22, p < 0.001$, Cohen's $d = -1.35$), 亦低于高教化功能组($t = -14.87, p < 0.001$, Cohen's $d = -1.88$), 控制组也显

著低于高教化功能组($t = -3.25, p = 0.001, \text{Cohen's } d = -0.41$)。结果表明, 对教化功能感知的操纵有效, 满足“MMM”设计的检验条件(1)。

5.6.2 利他程度和教化功能感知的交互作用对道德评价的影响

对行为道德性评价和行为人道德品质感知进行 2 (利他程度: 中度利他、高度利他) $\times$ 3 (教化功能操纵: 低教化功能组、控制组、高教化功能组) 的被试间方差分析。

行为道德性评价(见图 6a): 利他程度主效应显著, $F(1, 371) = 5.20, p = 0.023, \eta_p^2 = 0.01$, 高度利他组评分($M = 5.06, SD = 1.44$)显著低于中度利他组($M = 5.29, SD = 1.51$); 教化功能主效应显著, $F(2, 371) = 207.89, p < 0.001, \eta_p^2 = 0.53$, 低教化功能组评分($M = 3.68, SD = 1.24$)显著低于控制组($M = 5.71, SD = 1.04, t = -14.09, p < 0.001, \text{Cohen's } d = -1.78$)和高教化功能组($M = 6.13, SD = 0.72, t = -19.04, p < 0.001, \text{Cohen's } d = -2.41$), 控制组亦显著低于高教化功能组, $t = -3.61, p < 0.001, \text{Cohen's } d = -0.46$; 利他程度和教化功能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 $F(2, 371) = 2.94, p = 0.054, \eta_p^2 = 0.02$ 。简单效应分析显示, 在低教化功能组, 高度利他组($M = 3.73, SD = 1.08$)和中度利他组($M = 3.64, SD = 1.39$)评分差异不显著, $F(1, 371) = 0.23, p = 0.635$; 在控制组, 高度利他组评分($M = 5.44, SD = 1.26$)显著低于中

度利他组($M = 5.97, SD = 0.71$), $F(1, 371) = 8.73, p = 0.003, \eta_p^2 = 0.02$; 在高教化功能组, 高度利他组($M = 5.99, SD = 0.82$)和中度利他组($M = 6.26, SD = 0.58$)差异不显著, $F(1, 371) = 2.19, p = 0.139$ 。

行为人道德品质感知(见图 6b): 利他程度主效应不显著, $F(1, 371) = 0.28, p = 0.599$, 高度利他组评分($M = 5.72, SD = 0.95$)与中度利他组($M = 5.76, SD = 1.03$)的差异不显著; 教化功能主效应显著, $F(2, 371) = 62.89, p < 0.001, \eta_p^2 = 0.25$, 低教化功能组评分($M = 5.06, SD = 1.18$)显著低于控制组($M = 5.95, SD = 0.71, t = -7.38, p < 0.001, \text{Cohen's } d = -0.93$)和高教化功能组($M = 6.20, SD = 0.55, t = -9.83, p < 0.001, \text{Cohen's } d = -1.24$), 控制组亦显著低于高教化功能组($t = -3.05, p = 0.003, \text{Cohen's } d = -0.38$); 利他程度和教化功能的交互作用显著, $F(2, 371) = 4.89, p = 0.008, \eta_p^2 = 0.03$ 。简单效应分析显示, 在低教化功能组, 高度利他组评分($M = 5.22, SD = 1.10$)显著低于中度利他组($M = 4.90, SD = 1.25$), $F(1, 371) = 4.32, p = 0.038, \eta_p^2 = 0.01$; 在控制组, 高度利他组($M = 5.78, SD = 0.85$)显著低于中度利他组($M = 6.13, SD = 0.50$), $F(1, 371) = 5.25, p = 0.023, \eta_p^2 = 0.01$; 在高教化功能组, 高度利他组($M = 6.15, SD = 0.60$)和中度利他组($M = 6.26, SD = 0.50$)差异不显著, $F(1, 371) = 0.51, p = 0.476$ 。

表 4 教化功能感知的操作检验结果

变量	低教化功能组	控制组	高教化功能组	F	η_p^2
中度利他组	3.32 $\pm$ 1.32	5.36 $\pm$ 1.16	5.83 $\pm$ 0.83	73.46***	0.28
高度利他组	3.47 $\pm$ 1.34	4.87 $\pm$ 1.52	5.42 $\pm$ 1.16	40.80***	0.18
总计	3.39 $\pm$ 1.33	5.13 $\pm$ 1.37	5.62 $\pm$ 1.02	109.93***	0.37

注: $N = 377$. *** $p < 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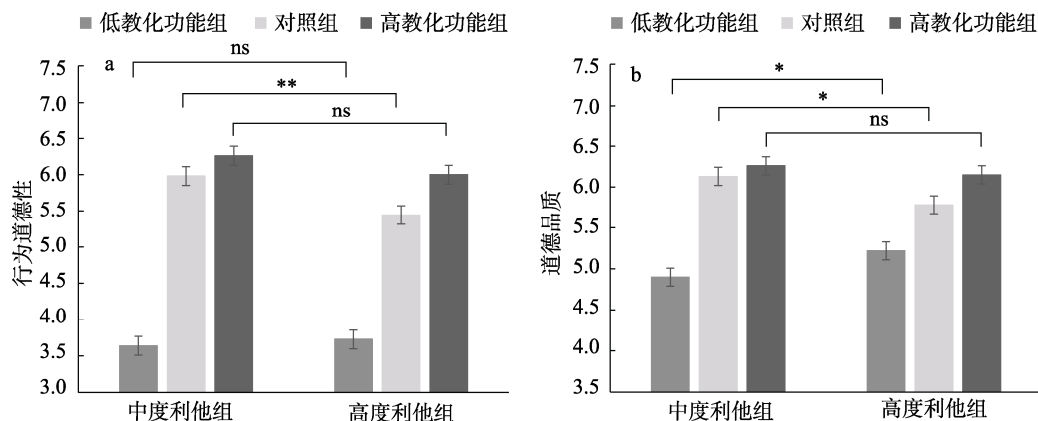


图 6 利他程度和教化功能在行为道德性和道德品质上的差异

注: 误差条表示标准误; * $p < 0.05$, ** $p < 0.01$, ns = not significant.

采用 PROCESS 宏程序模型 1 进一步检验自变量和所操纵的中介变量的交互项对因变量的影响(Hayes, 2013)。控制性别和年龄后, 以利他程度(中度利他组 = 0, 高度利他组 = 1)为自变量, 教化功能为调节变量, 行为道德性评价和道德品质感知为因变量进行分析。

以低教化功能组为调节变量(控制组 = 0, 低教化功能组 = 1), 利他程度和教化功能的交互项对行为道德性评价($b = 0.43$, $SE = 0.19$, $p = 0.028$, $95\% CI = [0.48, 0.81]$)和行为人道德品质感知($b = 0.68$, $SE = 0.25$, $p = 0.007$, $95\% CI = [0.19, 1.17]$)均显著。简单斜率检验(见图 7a-7b)显示, 在控制组, 利他程度显著负向预测行为道德性评价($b_{simple} = -0.36$, $SE = 0.14$, $p = 0.009$, $95\% CI = [-0.62, -0.09]$)和行为人道德品质感知($b_{simple} = -0.35$, $SE = 0.17$, $p = 0.046$, $95\% CI = [-0.69, -0.007]$); 在低教化功能组, 利他程度对行为道德性评价($b_{simple} = 0.07$, $SE = 0.14$, $p = 0.598$, $95\% CI = [-0.20, 0.35]$)和行为人道德品质感知($b_{simple} = 0.33$, $SE = 0.18$, $p = 0.061$, $95\% CI = [-0.02, 0.68]$)的预测均不显著。

以高教化功能组为调节变量(控制组 = 0, 高教化功能组 = 1), 利他程度和教化功能的交互项对行为道德性评价($b = 0.18$, $SE = 0.15$, $p = 0.232$)和行为人道德品质感知($b = 0.25$, $SE = 0.16$, $p = 0.127$)均不显著。

综上, 利他程度和所操纵的教化功能感知的交互项对道德评价(行为、行为人)均有显著影响, 满足“MMM”设计的检验条件(2)。

5.6.3 控制组中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 PROCESS 宏程序模型 4 检验控制组中教化功能感知是否在利他程度和道德评价之间

起到中介作用(Hayes, 2013)。控制性别和年龄后, 以利他程度(中度利他组 = 0, 高度利他组 = 1)为自变量, 教化功能感知为中介变量, 分别以行为道德性评价和道德品质感知为因变量进行分析。

利他程度显著负向预测行为道德性评价($b = -0.36$, $p = 0.003$); 利他程度负向预测教化功能感知($b = -0.31$, $p = 0.041$), 教化功能感知正向预测行为道德性评价($b = 0.48$, $p < 0.001$), 利他程度对行为道德性评价的直接效应显著($b = -0.20$, $p = 0.035$), 利他程度对行为道德性评价的间接效应显著($b_{indirect} = -0.15$, $SE = 0.08$, $95\% CI = [-0.34, -0.006]$)。结果表明, 在利他程度对行为道德性评价的影响中, 教化功能感知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利他程度显著负向预测道德品质感知($b = -0.35$, $p = 0.006$); 利他程度负向预测教化功能感知($b = -0.31$, $p = 0.041$), 教化功能感知正向预测道德品质感知($b = 0.28$, $p < 0.001$), 利他程度对道德品质感知的直接效应显著($b = -0.26$, $p = 0.029$), 利他程度对道德品质感知的间接效应显著($b_{indirect} = -0.09$, $SE = 0.06$, $95\% CI = [-0.24, -0.002]$)。结果表明, 在利他程度对道德品质感知的影响中, 教化功能感知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综上, 控制组内的中介模型成立, 满足“MMM”设计的检验条件(3)。

5.7 讨论

研究 2b 使用“MMM”方法, 进一步为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作用提供了因果证据。高教化功能感知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可能是因为时间成本被认为比金钱成本更昂贵(Johnson & Park, 2021), 导致“天花板效应”出现; 而低教化功能感知的调节作用显著, 表明操纵教化功能感知仍能有效调节利他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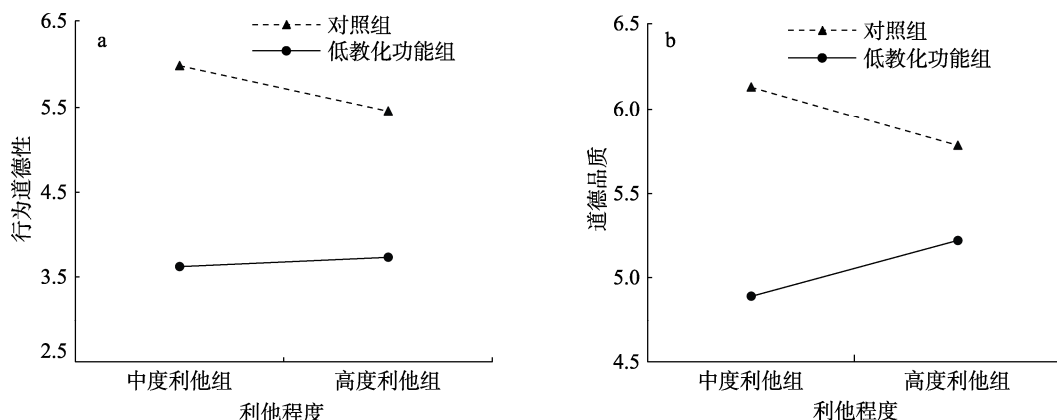


图7 教化功能对利他程度和道德评价的调节作用

与道德评价之间的关系。研究 2b 的结果满足了“MMM”设计所需要的因果证据条件(Ge, 2023)。此外, 总体利他程度对道德评价的主效应不显著, 可能是由于对教化功能感知的操纵导致了结果的混淆; 而进一步分析显示, 在控制组中, 利他程度能够显著负向预测道德评价, 因此, 该结果仍支持假设 1 和假设 2。

综上, 无论是在金钱成本还是时间成本的背景下, 研究 2a 和研究 2b 共同为教化功能感知在利他程度和道德评价(行为道德性和行为人道德品质)之间的中介作用提供了稳健的因果证据。

6 研究 3 特质自我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6.1 研究目的

研究 3 引入特质自我不确定性这一变量, 探讨其对利他程度和教化功能感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推测, 与低特质自我不确定性者相比, 高特质自我不确定性的观察者对高度利他行为的教化功能感知可能更为消极。

6.2 被试

参考研究 1a 和 1b, 分别计算出利他程度和道德评价主效应的效应量 $f = 0.25$ 和 $f = 0.30$ 。根据 G*power 3.1 的计算, 采用中等效应量 $f = 0.25$, 要达到 0.95 的统计效力, 每个条件至少需要 105 人, 一共需要 210 人。本研究通过线上问卷系统面向全国招募 320 名参与者, 剔除 25 名没有通过注意力检测项目的被试, 最终有效样本量为 295 人, 有效率为 92.19%。其中, 男性 114 人(38.60%), 女性 181 人(61.40%), 平均年龄 30.33 岁($SD = 10.73$), 年龄范围为 18~72 岁。

被试被随机分为两组: 中度利他者组 153 人(51.90%), 其阅读情境中的主人公为中度利他者, 帮助另一位志愿者完成了一半的工作; 高度利他者

组 142 人(48.10%), 其阅读情境中的主人公为高度利他者, 帮助另一位志愿者完成了全部的工作。

6.3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 自变量为利他程度(中度利他、高度利他), 因变量为道德评价(分成道德行为评价和道德品质感知), 中介变量为教化功能感知, 调节变量为特质自我不确定性。

6.4 实验程序

被试首先完成特质自我不确定性问卷的填写, 然后被随机分配到中度利他组或者高度利他组, 两组被试各自阅读两个关于利他行为的故事。阅读完毕后, 被试对故事中主人公行为的教化功能、行为道德性和道德品质分别进行评分。

6.5 实验材料

6.5.1 利他情境材料

同研究 2a。

6.5.2 测量变量

本研究中, 三个变量的测量方式均同研究 1a。教化功能感知为 4 个项目, $\alpha = 0.90$; 行为道德性评价为 3 个项目, $\alpha = 0.74$; 道德品质感知为 5 个项目, $\alpha = 0.76$ 。

6.5.3 特质自我不确定性

采用 Campbell 等(1996)编制的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 共 12 个条目, 用于评估自我概念的一致性与稳定性。采用 Likert 7 点计分(1 = 非常不符合, 7 = 非常符合, 含 2 个反向计分题项), 得分越高表示被试的特质自我不确定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 $\alpha = 0.93$ 。

6.6 研究结果

6.6.1 描述性统计

表 5 呈现了各变量间的相关矩阵, 对角线的下半部分为中度利他组, 对角线的上半部分为高度利他组。结果显示, 两组中观察者对利他行为道德性的评价和对行为人道德品质的感知均呈显著正相关。

表 5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1. 性别	—	-0.02	-0.19***	-0.18**	-0.12*	0.14*
2. 年龄	-0.03	—	0.27**	0.12*	0.20***	-0.42***
3. 教化功能	-0.24**	0.21**	—	0.69***	0.64***	-0.41***
4. 行为道德性	-0.17*	0.03	0.69***	—	0.79***	-0.28***
5. 道德品质	-0.11	0.07	0.56***	0.73***	—	-0.31***
6. 自我不确定性	0.18*	-0.36***	-0.40***	-0.29***	-0.33***	—

注: $N = 295$ 。性别为虚拟变量 0 = 男, 1 = 女;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6.6.2 利他程度对教化功能和道德评价的影响

对教化功能感知、行为道德性评价和行为人道德品质感知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见图8), 自变量为利他程度(中度利他、高度利他)。结果显示, 高度利他组($M = 4.55$, $SD = 1.58$)的教化功能感知显著低于中度利他组($M = 5.63$, $SD = 0.95$), $F(1, 293) = 51.75$, $p < 0.001$, $\eta_p^2 = 0.15$; 高度利他组($M = 5.49$, $SD = 1.19$)的行为道德性评价亦显著低于中度利他组($M = 6.02$, $SD = 0.76$), $F(1, 293) = 21.15$, $p < 0.001$, $\eta_p^2 = 0.07$; 高度利他组($M = 5.28$, $SD = 1.01$)的道德品质感知显著低于中度利他组($M = 5.85$, $SD = 0.63$), $F(1, 293) = 34.30$, $p < 0.001$, $\eta_p^2 = 0.11$ 。结果表明, 高度利他组在三项指标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中度利他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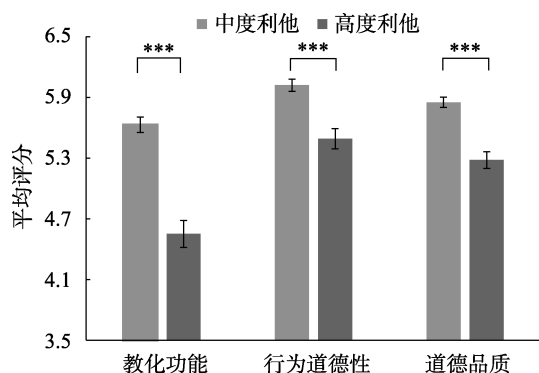


图8 利他程度在各因变量评分上的差异

注: 误差条表示标准误; *** $p < 0.001$ 。

6.6.3 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作用和自我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首先, 研究采用 PROCESS 宏程序模型 4 检验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作用(Hayes, 2013)。控制性别和年龄后, 以利他程度(中度利他组 = 0, 高度利他组 = 1)为自变量, 教化功能感知为中介变量, 分别以行为道德性评价和道德品质感知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利他程度显著负向预测行为道德性评价($b = -0.48$, $p < 0.001$), 支持假设 1。利他程度负向预测教化功能感知($b = -0.74$, $p < 0.001$), 教化功能感知正向预测行为道德性评价($b = 0.71$, $p < 0.001$), 利他程度对行为道德性评价的直接效应不显著($b = 0.05$, $p = 0.607$), 利他程度对行为道德性评价的间接效应显著($b_{indirect} = -0.53$, $SE = 0.08$, 95% CI = $[-0.70, -0.37]$); 利他程度显著负向预测行为道德品质感知($b = -0.63$, $p < 0.001$), 支持假设 1。利他程度负向预测教化功能感知($b = -0.74$, $p < 0.001$), 教化功能感知正向预测道德品质感知($b =$

0.59 , $p < 0.001$), 利他程度对道德品质感知的直接效应不显著($b = -0.19$, $p = 0.052$), 利他程度对道德品质感知的间接效应显著($b_{indirect} = -0.44$, $SE = 0.07$, 95% CI = $[-0.59, -0.31]$)。综上, 教化功能感知在利他程度对道德评价(行为、行为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支持假设 2。

其次, 采用 PROCESS 宏程序模型 7 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Hayes, 2013)。结果显示, 自我不确定性在利他程度对教化功能感知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b = -0.22$, $SE = 0.10$, $p = 0.021$, 95% CI = $[-0.41, -0.03]$), 验证假设 3。简单斜率检验(见图9)显示, 低自我不确定性条件下, 利他程度显著负向预测教化功能感知($b_{simple} = -0.47$, $SE = 0.14$, $p < 0.001$, 95% CI = $[-0.75, -0.20]$); 高自我不确定性条件下, 利他程度负向预测教化功能感知的作用更强($b_{simple} = -0.92$, $SE = 0.14$, $p < 0.001$, 95% CI = $[-1.19, -0.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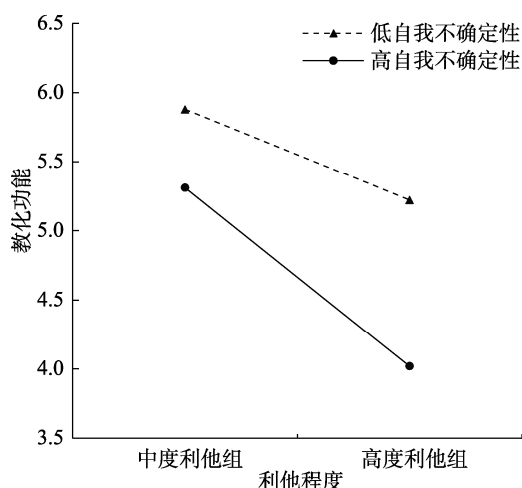


图9 自我不确定性对利他程度和教化功能的调节作用

对行为道德性评价的进一步分析发现, 低自我不确定性条件下, 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效应显著($b_{indirect} = -0.34$, $SE = 0.10$, 95% CI = $[-0.54, -0.17]$); 高自我不确定性条件下, 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效应更强($b_{indirect} = -0.65$, $SE = 0.12$, 95% CI = $[-0.90, -0.43]$)。结果表明, 利他程度通过教化功能感知对行为道德性评价的影响受到自我不确定性的调节,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 (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 = -0.16 , $SE = 0.07$, 95% CI = $[-0.30, -0.02]$), 验证假设 4。

对道德品质感知的进一步分析发现, 低自我不确定性条件下, 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效应显著($b_{indirect} = -0.28$, $SE = 0.08$, 95% CI = $[-0.44, -0.14]$);

高自我不确定性条件下,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效应更强($b_{indirect} = -0.55$, $SE = 0.10$, 95% CI = $[-0.76, -0.36]$)。结果表明,利他程度通过教化功能感知对道德品质感知的影响受到自我不确定性的调节,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 = -0.13$, $SE = 0.06$, 95% CI = $[-0.25, -0.02]$),验证假设 4。

6.7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观察者的特质自我不确定性通过调节利他程度和教化功能感知的关系,进而调节利他程度与道德评价之间的关系。高特质自我不确定性加剧了观察者从高度利他行为中感知到的低教化功能,而低特质自我不确定性则减弱了观察者从高度利他行为中感知到的低教化功能。假设 3 和假设 4 得到支持。

7 研究 4 状态自我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7.1 研究目的

研究 4 采用 Pfattheicher 和 Böhm (2018)提出的经典实验范式,通过情境回忆法启动被试的状态自我不确定性,检验其在利他程度与教化功能感知之间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假设,启动高自我不确定性将增强利他程度对教化功能感知的负面预测作用,而启动低自我不确定性(即自我确定性)则会削弱该作用。

考虑到自我不确定性启动需被试深度沉浸于回忆任务,且线上实验环境存在复杂性,为提升数据质量,本研究所有测量项目均采用 Likert 9 点计分,并适当增加样本量以确保统计效力。此外,基于前期研究反馈,对教化功能感知的测量条目在表述上进行了优化,使语言风格与格式更为统一,以提升量表信效度。

7.2 被试

鉴于研究 2a 和 2b 中观测到的交互作用效应量较低($f = 0.22$ 和 $f = 0.14$),研究 4 以交互作用效应量为目标效应,采用更保守的估计方法(Zhao & Biernat, 2022),以研究 2b 的交互作用效应量($f = 0.14$)为依据。根据 G*power 3.1 的计算,要达到 0.95 的统计效力,一共需要 665 人,每个条件至少需要 166 人。本研究通过线上问卷系统面向全国招募 800 名参与者,后续剔除 96 名不符合要求的被试,剔除标准包括未通过注意力检测、填写内容与指导语无关、答题存在大量重复或空白。最终有效样本量

为 704 人,有效率为 88.00%。其中,男性 233 人(33.10%),女性 471 人(66.90%),平均年龄 28.03 岁($SD = 8.22$),年龄范围为 18~67 岁。

被试被随机分为 4 组:低自我确定性-中度利他组 182 人,低自我确定性-高度利他组 171 人;高自我不确定性-中度利他组 188 人,高自我不确定性-高度利他组 163 人。

7.3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 2 (自我不确定性操纵:启动自我不确定性、启动自我确定性) $\times$ 2 (利他程度:中度利他、高度利他)的两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为道德评价(分成道德行为评价和道德品质感知),中介变量为教化功能感知。

7.4 实验程序

首先,将被试随机分配到自我不确定性启动组或自我确定性启动组,并在完成相应的启动任务后填写自我不确定性操作检验项目。随后,将被试再次随机分配到中度利他组或高度利他组,并阅读相应的利他情境。阅读完毕后,被试对故事中主人公行为的教化功能、行为道德性和道德品质分别进行评分。

7.5 实验材料

7.5.1 自我不确定性操纵

本实验的启动范式改编自 Pfattheicher 和 Böhm (2018)的研究,把被试随机分配到自我不确定性启动组和自我确定性启动组,通过指导语启动被试的不同状态(详见网络版附录)。

7.5.2 自我不确定性操纵检验

参考 Pfattheicher 和 Böhm (2018)的研究,在启动被试的自我不确定性后,通过 1 个问题测量其自我不确定程度,“在你填写上面的内容时,你感到有多不确定/确定? ”。采用 7 点计分,量表两端分别标注自我不确定性/自我确定性(1 = 感到最不确定,7 = 感到最确定),分数越低代表自我不确定性越高(自我确定性越低),得分越高代表自我不确定性越低(自我确定性越高)。

7.5.3 利他情境材料

同研究 2b。

7.5.4 测量变量

本研究对教化功能感知、行为道德性评价和道德品质感知进行测量,均采用 Likert 9 点计分(1 = 极其低,9 = 极其高),得分越高表示相应感知或评价水平越高。教化功能感知改编自 Carnes 等(2022),共 4 个项目(例如,“你觉得是否应该用 X 的行为教

导他人要怎么做?”), $\alpha = 0.87$; 行为道德性评价和道德品质感知的测量均同研究 2b, α 分别为 0.85 和 0.92。

7.6 研究结果

7.6.1 操纵检验

自我不确定组与自我确定组在自我不确定性程度上的差异显著, $F(1, 703) = 624.71, p < 0.001, \eta_p^2 = 0.47$, 自我不确定组($M = 3.13, SD = 1.93$)的得分显著低于自我确定组($M = 6.07, SD = 1.06$)。结果表明本研究的操纵有效。

7.6.2 描述性统计

表 6、7 分别呈现了中度利他组和高度利他组中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矩阵, 对角线的下半部分为自我不确定组, 对角线的上半部分为自我确定组。结果显示, 4 组中观察者对行为道德性的评价和对行为道德品质的感知均呈显著正相关。

7.6.3 利他程度和自我不确定性对教化功能和道德评价的影响

对教化功能感知、行为道德性评价和道德品质感知进行 2 (自我不确定性操纵: 自我不确定性启动组、自我确定性启动组) $\times$ 2 (利他程度: 中度利他组、高度利他组) 的被试间方差分析。教化功能感知(见图 10a): 利他程度主效应显著, $F(1, 700) = 35.18, p < 0.001, \eta_p^2 = 0.05$, 高度利他组($M = 5.37, SD = 1.88$)显著低于中度利他组($M = 6.11, SD = 1.55$); 自我不确定性主效应显著, $F(1, 700) = 23.55, p < 0.001, \eta_p^2 = 0.03$, 自我不确定组($M =$

$5.47, SD = 1.81$)显著低于自我确定组($M = 6.05, SD = 1.65$); 利他程度和自我不确定性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700) = 5.75, p = 0.017, \eta_p^2 = 0.01$ 。简单效应分析显示, 自我确定条件下, 高度利他组($M = 5.82, SD = 1.74$)的教化功能感知显著低于中度利他组($M = 6.27, SD = 1.52$), $F(1, 700) = 6.27, p = 0.012, \eta_p^2 = 0.01$; 自我不确定条件下, 高度利他组($M = 4.90, SD = 1.91$)的教化功能感知显著低于中度利他组($M = 5.96, SD = 1.57$), $F(1, 703) = 34.52, p < 0.001, \eta_p^2 = 0.05$ 。

行为道德性评价(见图 10b): 利他程度主效应显著, $F(1, 700) = 29.52, p < 0.001, \eta_p^2 = 0.04$, 高度利他组($M = 6.47, SD = 1.84$)显著低于中度利他组($M = 7.13, SD = 1.39$); 自我不确定性主效应不显著, $F(1, 700) = 0.83, p = 0.364$; 利他程度和自我不确定性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 $F(1, 700) = 2.32, p = 0.128$ 。

行为道德品质感知(见图 10c): 利他程度主效应显著, $F(1, 700) = 14.20, p < 0.001, \eta_p^2 = 0.02$, 高度利他组($M = 6.97, SD = 1.48$)显著低于中度利他组($M = 7.35, SD = 1.19$); 自我不确定性主效应不显著, $F(1, 700) = 0.07, p = 0.788$; 利他程度和自我不确定性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 $F(1, 700) = 0.01, p = 0.905$ 。

综上, 高度利他组在三项指标上均低于中度利他组; 自我不确定性仅在教化功能感知上与利他程度产生显著交互效应。

表 6 中度利他组内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变量	1	2	3	4	5
1. 性别	—	-0.08	-0.15*	-0.09	-0.01
2. 年龄	0.01	—	0.11	0.10	-0.02
3. 教化功能	-0.09	0.09	—	0.50***	0.34***
4. 行为道德性	0.02	0.04	0.59***	—	0.85***
5. 道德品质	0.04	0.01	0.42***	0.81***	—

注: $N = 704$. 性别为虚拟变量 0 = 男, 1 = 女; * $p < 0.05$, *** $p < 0.001$.

表 7 高度利他组内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变量	1	2	3	4	5
1. 性别	—	0.06	-0.06	-0.04	-0.02
2. 年龄	-0.12	—	0.10	0.05	0.02
3. 教化功能	-0.25**	0.10	—	0.62***	0.44***
4. 行为道德性	-0.11	0.08	0.55***	—	0.86***
5. 道德品质	-0.01	-0.07	0.28***	0.71***	—

注: $N = 704$. 性别为虚拟变量 0 = 男, 1 = 女; ** $p < 0.01$, *** $p < 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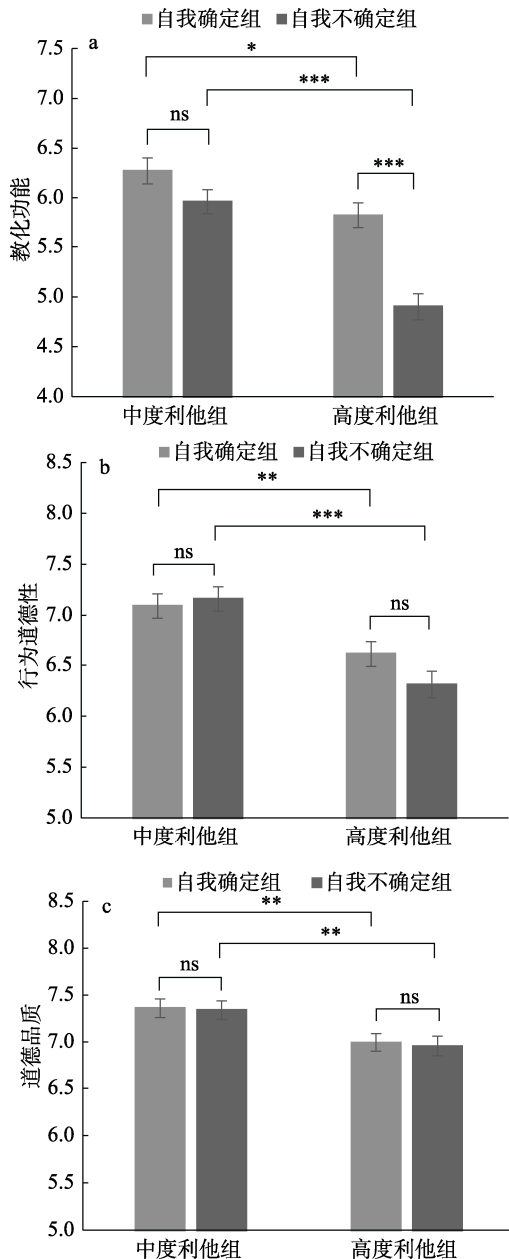


图 10 利他程度和自我不确定性在各因变量评分上的差异

注: 误差条表示标准误;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ns = not significant.

7.6.4 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作用和自我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首先, 研究采用 PROCESS 宏程序模型 4 检验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作用(Hayes, 2013)。控制性别和年龄后, 以利他程度(中度利他组 = 0, 高度利他组 = 1)为自变量, 教化功能感知为中介变量, 分别以行为道德性评价和道德品质感知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利他程度显著负向预测行为道德性评价($b = -0.40, p < 0.001$), 支持假设 1。利他程度负向预测教化功能感知($b = -0.41, p < 0.001$), 教化功能感知

正向预测行为道德性评价($b = 0.57, p < 0.001$), 利他程度对行为道德性评价的直接效应显著($b = -0.16, p = 0.010$), 利他程度对行为道德性评价的间接效应显著($b_{\text{indirect}} = -0.23, SE = 0.04, 95\% CI = [-0.32, -0.15]$); 利他程度显著负向预测道德品质感知($b = -0.28, p < 0.001$), 支持假设 1。利他程度负向预测教化功能感知($b = -0.41, p < 0.001$), 教化功能感知正向预测道德品质感知($b = 0.38, p < 0.001$), 利他程度对道德品质感知的直接效应不显著($b = -0.13, p = 0.079$), 利他程度对道德品质感知的间接效应显著($b_{\text{indirect}} = -0.16, SE = 0.03, 95\% CI = [-0.23, -0.09]$)。综上, 教化功能感知在利他程度对道德评价(行为、行为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支持假设 2。

其次, 采用 PROCESS 宏程序模型 7 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Hayes, 2013), 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均编码为虚拟变量(中度利他组 = 0, 高度利他组 = 1; 自我确定组 = 0, 自我不确定组 = 1)。结果显示, 自我不确定性在利他程度对教化功能感知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b = -0.33, SE = 0.14, p = 0.023, 95\% CI = [-0.61, -0.05]$), 验证假设 3。简单斜率检验(见图 11)表明, 自我确定性条件下, 利他程度显著负向预测教化功能感知($b_{\text{simple}} = -0.26, SE = 0.10, p = 0.011, 95\% CI = [-0.46, -0.06]$); 自我不确定性条件下, 利他程度负向预测教化功能感知的作用更强($b_{\text{simple}} = -0.58, SE = 0.10, p < 0.001, 95\% CI = [-0.78, -0.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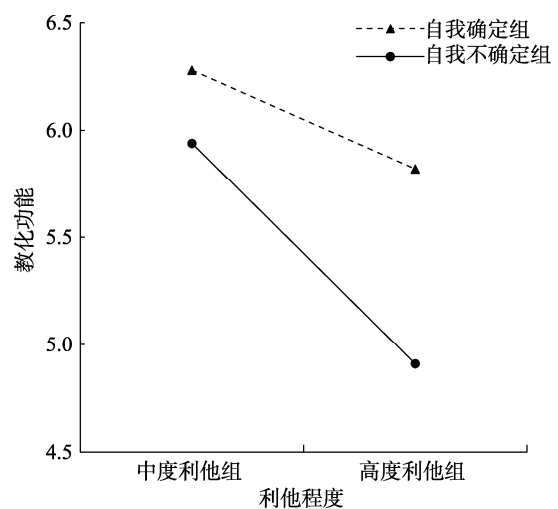


图 11 自我不确定性对利他程度和教化功能的调节作用图

对行为道德性评价的进一步分析发现, 自我确定性条件下, 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效应显著($b_{\text{indirect}} =$

-0.15, $SE = 0.06$, 95% $CI = [-0.26, -0.04]$); 自我不确定性条件下, 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效应更强($b_{indirect} = -0.33$, $SE = 0.06$, 95% $CI = [-0.46, -0.21]$)。结果表明, 自我不确定性通过调节利他程度和教化功能感知的关系进而调节利他程度和行为道德性评价的关系,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 = -0.19$, $SE = 0.08$, 95% $CI = [-0.35, -0.03]$), 验证假设4。

对道德品质感知的进一步分析发现, 自我确定性条件下, 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效应显著($b_{indirect} = -0.10$, $SE = 0.04$, 95% $CI = [-0.18, -0.02]$); 自我不确定性条件下, 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效应更强($b_{indirect} = -0.22$, $SE = 0.05$, 95% $CI = [-0.32, -0.14]$)。结果表明, 自我不确定性通过调节利他程度和教化功能感知的关系进而调节利他程度和道德品质感知的关系,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 = -0.12$, $SE = 0.06$, 95% $CI = [-0.24, -0.02]$), 验证假设4。

7.7 讨论

研究4的结果表明, 自我不确定性通过调节利他程度与教化功能感知之间的关系, 进而影响了观察者对不同利他行为的道德评价。具体而言, 高状态自我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观察者从高度利他行为中感知到的低教化功能, 而低状态自我不确定性则削弱了这种负向感知。假设3和假设4再次得到验证。

8 研究5 利他程度对教化功能感知和道德评价的影响: 基于内部元分析

8.1 研究目的

研究5采用内部元分析方法, 对前述多项实验的数据进行整合, 旨在估计利他程度对教化功能感知及道德评价(行为道德性与行为道德品质)的整体效应量, 并检验该效应在不同实验中的一致性、异质性及稳健性, 从而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及整体论证的连贯性。

8.2 元分析过程

8.2.1 效应量

本研究对6个研究的数据进行内部元分析, 其中研究2a和2b仅采用控制组。本研究使用Hedge's g 作为利他程度对教化功能感知和道德评价影响的效果量, Hedge's g 是一种常用的标准化均值差异效应量指标(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 SMD), 用

于衡量两组之间的平均差异的大小(Hedges & Tipton, 2010)。本研究采用Stata 18进行数据处理。

8.2.2 模型选定

采用 Q 和 I^2 进行异质性检验。对于利他程度对教化功能感知的影响, 根据异质性检验结果($Q = 20.89$, $p < 0.001$, $I^2 = 75.67\%$), 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对于利他程度对行为道德性的影响, 根据异质性检验结果($Q = 5.20$, $p = 0.392$, $I^2 = 3.82\%$),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于利他程度对教化功能感知的影响, 根据异质性检验结果($Q = 15.09$, $p = 0.010$, $I^2 = 67.80\%$), 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8.3 结果

如图12所示, 综合所有研究结果($k = 6$)发现, 相较于中度利他行为, 观察者对高度利他行为的教化功能感知更低, 两组平均数差异显著(Hedge's $g = -0.66$, 95% $CI = [-0.86, -0.45]$, $z = -6.24$, $p < 0.001$), 对高度利他行为的行为道德性评价更低, 两组平均数差异显著(Hedge's $g = -0.51$, 95% $CI = [-0.60, -0.41]$, $z = -10.56$, $p < 0.001$), 对高度利他者的道德品质感知更低, 两组平均数差异显著(Hedge's $g = -0.48$, 95% $CI = [-0.66, -0.30]$, $z = -5.29$, $p < 0.001$)。

8.4 讨论

研究5通过跨实验的内部元分析整合了此前全部子研究($k = 6$)的结果, 结果表明, 相较于中度利他行为, 观察者对高度利他行为的教化功能感知和道德评价均显著更低。所有子研究估计的效应量置信区间均在参考线的同一侧, 且整体元分析结果显示出高度一致性。这一发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单个研究偶然显著造成结论偏差的可能性, 提升研究结果的总体稳健性(Vosgerau et al., 2019)。

9 总讨论

9.1 高度利他行为和道德评价

本研究通过7项子研究系统探讨了利他行为的程度与道德评价之间的复杂关系。结果表明, 观察者对高度利他行为的道德评价显著低于中度利他行为, 且对行为本身与行为人的评价呈现同步下降趋势。

研究表明, 人们对利他行为的评价并非遵循“越多越好”的线性逻辑, 而是存在一个被普遍认可的“适宜区间”。中度利他行为被视为“恰如其分”, 而高度利他行为则易被贴上“过度”“不切实际”的标签。这一差异并非否定高度利他行为的价值, 而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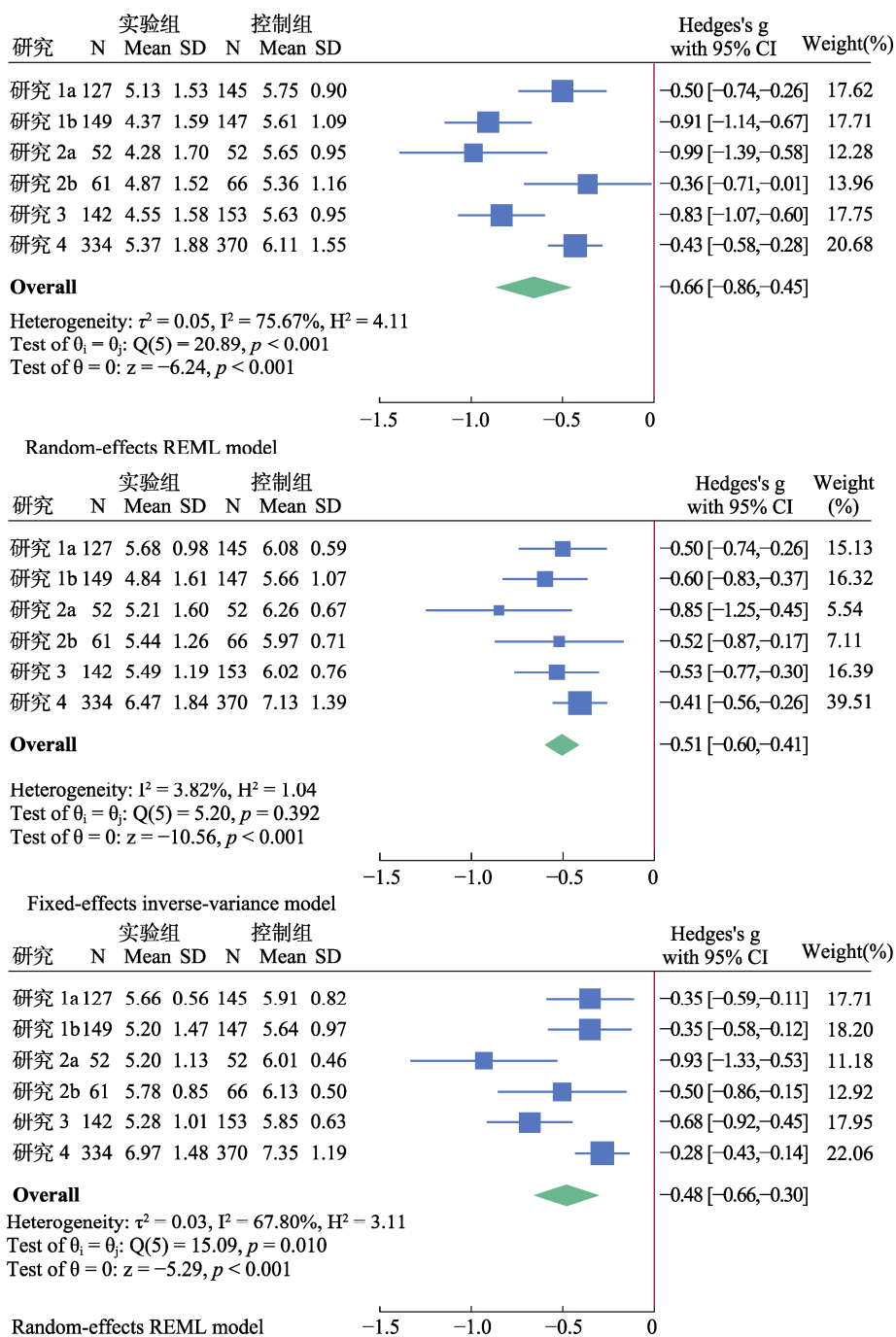


图 12 元分析结果

能反映了人们在“适度”与“可接受性”判断中的社会直觉偏差。从儒家伦理视角看,“仁”指向真诚向善,“善”体现为恰当人际关系的实现(傅佩荣, 2023)。高度利他者可能被质疑为虚情假意、夸耀甚至伪善(Berman & Silver, 2022), 其行为也可能被解读为自我吹嘘或自我感动, 进而引发反社会惩罚(Pleasant & Barclay, 2018)。从恰如其分的角度看, 这类行为易被视为不合时宜、充满疑问甚至存在潜在风险(Kawamura & Kusumi, 2020; Klein & Epley, 2014,

Vonasch et al., 2024), 导致观察者持否定与回避态度。道德不仅意味着“有所为”, 亦包括“有所不为”; 它不是机械的“多多益善”, 而是讲求适度与恰当, 否则便“过犹不及”。

本研究为重新审视利他行为与道德评价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道德评价差异本质反映了评价标准的不同。根据 Pfattheicher 等(2022)对利他行为的界定, 可归纳两类传统解释框架: 一是成本-收益取向, 关注接受者的实际收益, 契合结果主义

(Miller, 2012), 认为利他程度越高评价应越高 (Kawamura et al., 2021); 二是意图-动机取向, 强调行为人的利他意图, 契合以人为中心的道德评价 (Schwartz & Inbar, 2023), 预测利他程度越高, 对行为的评价越高, 而对行为人的评价反而越低, 出现“行为-人”分离 (Schwartz & Inbar, 2023)。而本研究中对行为及行为人的评价一致下降, 与上述框架均不符: 若依成本-收益取向, 评价不应降低; 若基于意图-动机观点, 则两类评价不应一致。这一矛盾提示存在第三种解释机制: 随着利他程度的提高, 对行为及行为人的道德评价遵循同一社会认知规则同步下降。据此, 本研究提出社会视角的利他主义作为第三类解释框架, 认为利他行为需符合社会价值期望与规范许可 (Bykov, 2017), 相关研究应跳出成本与意图的传统桎梏, 转而从社会视角予以重新审视。

社会视角的利他理论进一步支持上述解释: 高度利他行为因偏离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准则, 易被视为不适用于日常问题解决的行为。它无形中抬高了道德门槛, 给他人带来道德负担, 引发对行为者动机的怀疑, 削弱合作意愿, 进而使人们对高度利他行为及行为者产生道德忧虑。现代数据与古典箴言交汇说明, “适度”并非贬善, 而是对可持续善行的保护。需指出的是, 高度利他行为的道德评分虽相对略低, 但仍高于平均值, 表明其仍被普遍视为一种积极的利他行为。正所谓“黄金有疵, 白玉有瑕”, 公众以辩证眼光行使“道德投票权”: 既不忽视其道德光芒, 也警惕因过度褒奖而偏离道德本意。这反映出人们不仅关注道德的外在表现, 更重视其内在本质——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可理解为一种恰当关系的体现。

综上, 本研究提示在倡导利他行为时, 应把握公众认知框架, 通过教育引导、公共叙事构建和政策支持等, 将“高度利他”重新定义为兼具可持续性、理性决策和激励他人向善的典范行为。本研究既深化了对利他行为及其评价机制的学理探讨, 也启示我们应在鼓励善行的同时, 推动社会对“适宜利他”与“可持续行善”的深层认同, 既充分肯定“量力而行”的中度善行, 也积极倡导“力所能及”的高度利他行为, 从而促进更广泛的道德共识, 使每一份善意都能被准确理解、充分接纳并持续生长。

9.2 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7项子研究一致表明, 教化功能感知在利他程度和道德评价之间起关键中介作用, 既揭

示了利他程度影响道德评价的具体路径, 也解释了为何对行为和行为人的评价会呈现一致性变化。

本研究尝试整合儒家教化思想与现代心理学中的社会功能视角。儒家强调“择其善者而从之”, 主张通过观察学习他人德行规范自身行为, 以道德教化实现群体秩序与社会和谐 (傅佩荣, 2023)。这与 Carnes 等 (2022) 提出的社会功能模型高度契合, 即个体会根据行为是否具有教化价值——能否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规范性方案——进行道德判断。传统研究多聚焦于动机分析或成本-收益框架, 而忽视了道德行为的社会价值维度。在社会视角的利他主义框架中, 教化功能感知可同时作为评价行为和行为人的统一标准。通过“MMM”设计, 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该中介作用的稳健性, 这也佐证了同伴控制机制 (Tomasello, 2016): 个体在群体中会主动形成规范以引导成员行为, 鼓励集体利益导向的行为, 抑制损害集体的行为。这种对行为的调控反映了人们主动塑造社会环境的意愿。道德标准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Tetlock, 2002), 其核心目的在于促进社会发展 (Ellemers et al., 2019), 这也构成了区别于意图或成本的第三种解释框架。这种基于社会视角的利他主义的解释拓展了道德认知的边界, 为理解社会行为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支撑。

本研究进一步提出, 社会视角的利他主义与“以问题为中心的视角”相契合, 为理解高度利他行为的评价差异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道德合作理论强调道德的核心功能在于促进社会合作, 主张从具体问题出发进行道德判断 (Curry, 2016; Curry et al., 2019)。在此框架下, 一种行为能否有效解决问题并推动合作成为评判其道德价值的重要标准。该逻辑与中国传统思想中“小仁”与“大义”之辨相通: 相较于聚焦个体善举的“小仁”, 更重视促进集体利益的“大义”。依此逻辑, 高度利他行为可能因其对合作体系的潜在负面影响 (孙倩, 2022) 而引发较低道德评价。此外, 此类行为可能被解读为拒绝合作的信号: 当个体过度牺牲自我资源时, 可能违背了社会对公平互惠的合作期待, 形成一种非合作甚至反合作的行为模式。因此, 尽管高度利他者展现出自我牺牲精神, 却可能被视为破坏合作机制的“独行者”, 难以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

9.3 自我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研究3和4的结果表明, 自我不确定性在利他程度与教化功能感知之间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 低自我不确定性能够缓解个体对高度利他行为的

负面教化功能感知,从而减弱对其的道德评价下降;而高自我不确定性则会强化这一负面感知,进而加剧道德评价的降低。

高自我不确定性会削弱个体的安全感和内部稳定性,使其更关注潜在风险,表现出短视倾向与较低的人际信任(Pfattheicher & Böhm, 2018; Wu et al., 2022)。这类个体更易从负面角度解读高度利他行为,放大其“幻影成本”(Vonasch et al., 2024)。同时,为缓解不确定性,他们往往会表现出更强的从众倾向与群体认同,如更倾向于参照他人行为(Choi & Hogg, 2020; Hogg, 2021),更认可符合群体规范的中度利他行为,而排斥偏离常规的高度利他行为。此外,高自我不确定性的个体也更倾向于维护公平价值观(焦丽颖 等, 2022; 杨庆 等, 2017; Capraro et al., 2021),高度利他行为因偏离公平原则而易引发其价值观防御。

另一方面,提升个体的自我确定性能够有效缓解其对高度利他行为的负面教化功能感知,进而改善道德评价。作为自我不确定性的对立面,自我确定性使个体感到自身与环境是安全、可控且有意义的(杨庆 等, 2017),从而提升幸福感(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14)和亲社会倾向,降低对群体认同和价值观防御的需求,使其能以更开放的视角看待高度利他行为。这一发现不仅深化了对自我确定性作用机制的理解,也为改善对非常规利他行为的道德评价提供了实践启示。

历史和社会发展经验表明,社会变迁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个体的心理状态、行为模式与价值观体系(吴胜涛 等, 2024)。本研究结果显示,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会影响个体的自我不确定性进而作用于观察者对利他行为的评价过程。结合社会视角的利他主义,本研究提出基于社会层面的解释:当个体经历的不确定性事件较少(如社会环境稳定和谐)时,更倾向于欣赏和鼓励他人的无私付出;当不确定性事件较多(如社会环境动荡不安)时,则更注重追求公平以保全个人资源。具体环境事件影响个体当下的状态自我不确定性,特质自我不确定性则是长期处于高自我不确定性状态的结果,感受到自我不确定性的个体会采取行动缓解该状态(Hogg, 2021)。在本研究中,自我不确定性影响人们对利他行为的认知理解,并通过道德评价外显表达,反映出个体主动参与道德观念建构与社会环境塑造的意愿。从状态到特质、从短期到长期、从作用与反作用,本研究揭示了“环境-个体”相互影响的过程,为解释社会

变迁背景下道德评价的变化提供了新视角。

9.4 研究启示

本研究为理解利他行为及其道德评价提供了新视角,明确了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作用与自我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并对推动可持续善行具有重要启示。首先,基于社会视角的利他主义,本研究挑战了“利他程度越高越道德”的传统预设,突破了以往仅从成本维度理解利他行为的局限,将关注点转向行为背后的社会意义与可持续性,为重新审视利他行为提供了新框架。其次,教化功能感知作为关键中介变量,在利他行为和道德评价之间发挥核心作用,为基于社会视角的利他-道德评价体系提供了实证支持。最后,自我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揭示了社会环境对个体的深层影响,特质和状态自我不确定性的共同作用表明,环境通过影响个体的心理状态,进而影响其对利他行为的道德评价,体现了环境与个体之间的动态互动。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丰富了对利他行为和道德评价的理解,为道德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方法。在实践层面,本研究可为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参考,助力其优化促进利他行为的干预方案设计与实施,有效引导社会善行向可持续方向发展,使每一份善意都能在“被欣赏”与“被模仿”之间找到平衡点,真正实现善行的良性循环与道德生态的持续建设。

9.5 不足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采用的利他情境主要基于独裁者游戏范式,通过在匿名第三方评价中设置极端分配条件(全部给予 vs 给予一半),并排除受助者身份信息及观察者的自我卷入,使观察者处于信息相对受限的判断环境。因此,研究结论可能更适用于特定情境下的利他行为评价,如在匿名背景、网络环境或陌生人互动情境中;在现实复杂情境中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验证。未来研究可通过引入更丰富、更贴近真实社会互动的情境设计,以验证并拓展本研究的发现。此外,本研究主要聚焦于道德评价维度,尚未涵盖利他行为可能涉及的多方面评判,如人际吸引力或可信度等(Kawamura & Kusumi, 2020)。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视角,构建多维度、综合性的利他行为评价框架,从而更全面把握其社会认知与影响机制。

其次,本研究虽证实了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作用,但其与其他潜在解释变量的关系尚待厘清。同时,研究采用的教化功能启动范式尚属较新尝试,

虽通过操纵检验观察到预期效应,但其稳定性和外部效度仍需在更大样本及不同情境中予以验证。此外,既有理论提示诸多心理现象呈倒U型关系(Coombs & Avrunin, 1977; Grant & Schwartz, 2011),本研究聚焦于该曲线的下降段机制,而未描绘其完整轨迹。未来研究可系统探索完整曲线的动态过程,整合多元解释路径,以构建更完善的理论体系。

最后,本研究同时考察了特质和状态自我不确定性,发现二者均对利他程度和教化功能感知具有调节作用。然而,研究4仅操纵了状态自我不确定性,未对特质自我不确定性加以控制,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状态自我不确定性效应的纯净度。未来研究可在启动状态自我不确定性的同时,控制个体的特质自我不确定性,以更精准地揭示其作用机制。此外,本研究着重探讨了自我不确定性在利他程度与道德评价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发现其会削弱个体的亲社会倾向。但也有研究指出,不确定性在某些情境下可能促进亲社会意愿(Kappes et al., 2018),表明自我不确定性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更复杂的机制。未来研究应综合考虑不同情境下不确定性的多重作用路径,以构建更具解释力与整合性的理论框架。

10 结论

(1)利他程度对道德评价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相较于中度利他行为,人们对高度利他行为的道德评价更低,这一效应同时体现在对行为本身的道德性评价和对行为人的道德品质感知两个维度。

(2)教化功能感知在利他程度与道德评价之间起中介作用:人们通过感知利他行为的教化功能,进而形成对利他行为和利他者的道德评价。这一认知路径构成了利他程度影响道德评价的关键机制。

(3)自我不确定性调节了利他程度和教化功能感知之间的关系:高自我不确定性加剧人们对高度利他行为教化功能的负面评价,而低自我不确定性则有效缓解这种负面感知。

(4)自我不确定性通过调节利他程度与教化功能感知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利他程度与道德评价之间的关系。这一发现揭示了自我不确定性在利他行为道德评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参 考 文 献

Aguinis, H., Beaty, J. C., Boik, R. J., & Pierce, C. A. (2005).

- Effect size and power in assessing moderating effects of categorical variables using multiple regression: A 30-year review.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0(1), 94–107.
- Anderson, R. A., Crockett, M. J., & Pizarro, D. A. (2020). A theory of moral prais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4(9), 694–703.
- Ashton, M. C., & Lee, K. (2009). The HEXACO–60: A short measure of the major dimensions of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91(4), 340–345.
- Bai, F., Wu, W., & Bao, S. (2019, July). Moral but dominant: When do-gooders get derogated. In *Academy of Management Proceedings* (Vol. 2019, No. 1, p. 14563). Briarcliff Manor, NY 10510: Academy of Management.
- Berman, J. Z., & Silver, I. (2022). Prosocial behavior and reputation: When does doing good lead to looking good?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43, 102–107.
- Berry, Z., & Lucas, B. J. (2024). How much is en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social effort and moral character judgment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50(5), 659–678.
- Bhagal, M. S., Farrelly, D., Galbraith, N., Manktelow, K., & Bradley, H. (2020). The role of altruistic costs in human mate choic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60, 109939.
- Bocian, K., Baryla, W., Kulesza, W. M., Schnall, S., & Wojciszke, B. (2018). The mere liking effect: Attitudinal influences on attributions of moral character.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79, 9–20.
- Bolderdijk, J. W., Brouwer, C., & Cornelissen, G. (2018). When do morally motivated innovators elicit inspiration instead of irritat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2362.
- Bykov, A. (2017). Altruism: New perspectives of research on a classical theme in sociology of morality. *Current Sociology*, 65(6), 797–813.
- Campbell, J. D., Trapnell, P. D., Heine, S. J., Katz, I. M., Lavalley, L. F., & Lehman, D. R. (1996). Self-concept clarity: Measurement, personality correlates,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6), 141–156.
- Capraro, V., Jordan, J. J., & Tappin, B. M. (2021). Does observability amplify sensitivity to moral frames? Evaluating a reputation-based account of moral preferenc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94, 104103.
- Carnes, N. C., Allmon, B., Alva, J., Cousar, K. A., & Varnam, Z. D. (2022). How morality signals, benefits, binds, and teach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01, 104313.
- Chen, J., Zhang, R., Yuan, J., & She, S. (2022). Antisocial punishment in the game.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30(2), 436–448.
- [陈璟, 张融, 袁佳琦, 余升翔. (2022). 博弈中的反社会惩罚. *心理科学进展*, 30(2), 436–448.]
- Choi, E. U., & Hogg, M. A. (2020). Self-uncertainty and group identification: A meta-analysis.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23(4), 483–501.
- Chung, M., & Saini, R. (2022). Consumer self-uncertainty increases price dependency.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40, 40–48.
- Coombs, C. H., & Avrunin, G. S. (1977). Single-peaked functions and the theory of preference. *Psychological Review*, 84(2), 216–230.
- Curry, O. S. (2016). Morality as cooperation: A problem-centred approach. In T. K. Shackelford & R. D. Hansen (Eds.), *The evolution of morality* (pp. 27–51).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Curry, O. S., Mullins, D. A., & Whitehouse, H. (2019). Is it good to cooperate? Testing the theory of morality-as-cooperation in 60 societies. *Current Anthropology*, 60(1), 47–69.
- Dawes, C. T., Fowler, J. H., Johnson, T., McElreath, R., & Smirnov, O. (2007). Egalitarian motives in humans. *Nature*, 446(7137), 794–796.
- De Cremer, D., & Sedikides, C. (2009). The whys and whens of personal uncertainty.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4), 218–220.
- Ellemers, N., Van Der Toorn, J., Paunov, Y., & Van Leeuwen, T. (2019). The psychology of morality: 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empirical studies published from 1940 through 2017.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3(4), 332–366.
- Fritz, M. S., & MacKinnon, D. P. (2007). Required sample size to detect the mediated effect.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3), 233–239.
- Fu, P. (2023). *Fu Peirong unscrambles the Analects* (Rev. ed.). Beijing: Oriental Press.
- [傅佩荣. (2023). 傅佩荣解读论语 (修订版). 北京: 东方出版社.]
- Ge, X. (2023). Experimentally manipulating mediating processes: Why and how to examine mediation using statistical moderation analys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09, 104507.
- Grant, A. M., & Schwartz, B. (2011).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The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of the inverted U.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6(1), 61–76.
- Hayes, A. F. (2013).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Guilford publications.
- Hedges, L. V., & Tipton, E. (2010). Meta-analysis. In Steptoe, A. et al. (Ed.), *Handbook of Behavioral Medicine: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pp. 909–921). New York, NY: Springer New York.
- Ho, M. K., Cushman, F., Littman, M. L., & Austerweil, J. L. (2019). People teach with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as communication, not reinforceme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8(3), 520–549.
- Hogg, M. A. (2007). Uncertainty-identity theory.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9, 69–126.
- Hogg, M. A. (2009). Managing self-uncertainty through group identification.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4), 221–224.
- Hogg, M. A. (2021). Self-uncertainty and group identification: Consequences for social identity, group behavior, intergroup relations, and society. In B. Gawronski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64, pp. 263–316). Academic Press.
- Jiao, L., Xu, Y., Tian, Y., Guo, Z., & Zhao, J. (2022). The hierarchies of good and evil personality trait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4(7), 850–866.
- [焦丽颖, 许燕, 田一, 郭震, 赵锦哲. (2022). 善恶人格的特质差序. *心理学报*, 54(7), 850–866.]
- Johnson, S. G., & Park, S. Y. (2021). Moral signaling through donations of money and tim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65, 183–196.
- Kappes, A., Nussberger, A. M., Faber, N. S., Kahane, G., Savulescu, J., & Crockett, M. J. (2018). Uncertainty about the impact of social decisions increases prosocial behaviour. *Nature Human Behaviour*, 2(8), 573–580.
- Kawamura, Y., & Kusumi, T. (2020). Altruism does not always lead to a good reputation: A normative explan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90, 104021.
- Kawamura, Y., Ohtsubo, Y., & Kusumi, T. (2021). Effects of cost and benefit of prosocial behavior on reputation.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2(4), 452–460.
- Klein, N., & Epley, N. (2014). The topography of generosity: Asymmetric evaluations of prosocial ac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3(6), 2366–2379.
- Macdonnell, R., & White, K. (2015). How construals of money versus time impact consumer charitable giving.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2(4), 551–563.
- Malle, B. F. (2021). Moral judgment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72(1), 293–318.
- Meng, X., & Moriguchi, Y. (2021). Neural basis for egalitarian sharing in five-to six-year-old children. *Neuropsychologia*, 154, 107787.
- Miller, D. E. (2012). Utilitarianism and consequentialism. In Gaus, G. et al.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pp. 329–341). Routledge.
- Noguti, V., & Bokeyar, A. L. (2014). Who am 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oncept uncertainty and materi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9(5), 323–333.
- Pfafftheicher, S., & Böhm, R. (2018). Honesty-humility under threat: Self-uncertainty destroys trust among the nice guy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4(1), 179–194.
- Pfafftheicher, S., Nielsen, Y. A., & Thielmann, I. (2022). Prosocial behavior and altruism: A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44, 124–129.
- Pleasant, A., & Barclay, P. (2018). Why hate the good guy? Antisocial punishment of high cooperators is greater when people compete to be chose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9(6), 868–876.
- Reed II, A., Kay, A., Finnel, S., Aquino, K., & Levy, E. (2016). I don't want the money, I just want your time: How moral identity overcomes the aversion to giving time to prosocial caus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0(3), 435–457.
- Schwartz, S. A., & Inbar, Y. (2023). Is it good to feel bad about littering? Conflict between moral beliefs and behaviors for everyday transgressions. *Cognition*, 236, 105437.
- Seligman, M. E., & Csikszentmihalyi, M. (2014). Positive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In Csikszentmihalyi, M. (Ed.), *Flow and the foundations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pp. 279–298).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 Sun, Q. (2022). *The effect of distributive fairness on cooperative behavior in social dilemmas: Tradeoffs between fairness and self-benefit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孙倩. (2022). 分配公平对社会困境中合作行为的影响: 公平与利益的权衡 (博士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 Sun, S., Zhao, H., Pi, Q., & Zhang, H. (2025). The paradox in moral character judgement of highly altruistic individuals: Investigating the role of predictability and honesty - humi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5(4), 624–639.
- Sun, X., Han, L., Wang, M., Liu, S., & Shen, Y. (2023). Social exclusion with antisocial punishment in spatial public goods game. *Physics Letters A*, 474, 128837.
- Tai, K., Lin, K. J., Lam, C. K., & Liu, W. (2023). Biting the hand that feeds: A status-based model of when and why receiving help motivates social undermining.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8(1), 27–52.
- Tasimi, A., Dominguez, A., & Wynn, K. (2015). Do-gooder derogation in children: The social costs of generosity.

-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6, 1036.
- Tetlock, P. E. (2002). Social functionalist frameworks for judgment and choice: Intuitive politicians, theologians, and prosecutors. *Psychological Review*, 109(3), 451–471.
- Tomasello, M. (2016). *A natural history of human moral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Uhlmann, E. L., Pizarro, D. A., & Diermeier, D. (2015). A person-centered approach to moral judgment.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1), 72–81.
- Van den Bos, K. (2009). Making sense of life: The existential self-trying to deal with personal uncertainty.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4), 197–217.
- Vonasch, A. J., Mofradidoost, R., & Gray, K. (2024). People reject free money and cheap deals because they infer phantom cost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51(10), 2050–2067.
- Vosgerau, J., Simonsohn, U., Nelson, L. D., & Simmons, J. P. (2019). 99% impossible: A valid, or falsifiable, internal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8(9), 1628–1639.
- Wu, S., Wang, Y., & Peng, K. (2024). More utilitarian and less rational? Social change and two types of individualism over the last 40 years in China.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6(7), 911–925.
- [吴胜涛, 王子灵, 彭凯平. (2024). 理性式微、功利扩张? 近40年中国社会两种个人主义的变迁. *心理学报*, 56(7), 911–925.]
- Wu, X., Li, J., & Li, Y. (2022). The impact of uncertainty induc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intertemporal choi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03, 104397.
- Wu, Y. (2021). How uncertainty impacts on the identity of extreme groups in the global crisis. *Sociological Review of China*, 9(2), 157–172.
- [吴莹. (2021). 全球危机中不确定性如何影响极端群体认同的形成. *社会学评论*, 9(2), 157–172.]
- Yang, Q., Bi, C., Li, L., & Huang, X. (2017). Self-uncertainty: Concepts, structures, and theorie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6), 1012–1024.
- [杨庆, 毕重增, 李林, 黄希庭. (2017). 自我不确定感: 内涵、结构和理论. *心理科学进展*, 25(6), 1012–1024.]
- Zhao, X., & Biernat, M. (2022). Status of immigrants' country of origin and Americans' assimilation expect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2(3), 443–468.

Beyond “The more the better”: The impact of altruism degree on moral evaluation and its moderating mechanism

SUN Sijie, ZHAO Huanhuan, PI Qiao, ZHANG Heyun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Moral evaluation involves assessing the goodness or wrongness of actions and personal qualities. While altruism—defined as actions intended to enhance the well-being of others, often through resource allocation—is generally valued, a societal perspective posits that altruistic actions are also expected to align with prevailing social norm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a seemingly paradoxical phenomenon: highly altruistic behavior is occasionally judged as less moral than moderately altruistic behavior. Drawing on the social functionalist perspective, we propose that observers perceive highly altruistic behavior as possessing a weaker teaching function; that is, as being less effective in guiding social life and establishing beneficial behavioral norms, consequently leading to lower moral evaluations. Furthermore, self-uncertainty, which is a negative experience stemming from doubts regarding one's important traits or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can influence social cognition and, consequently, moral evaluations.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truistic behavior and moral evaluation, examin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teaching function perception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elf-uncertainty, with the aim of fostering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altruism and moral evaluation to promote societal harmony.

Seven studies were conducted to test the hypothesized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Initial scenario-based designs in Studies 1a ($N = 272$) and 1b ($N = 296$)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altruism degree, moral evaluation, and teaching function perception in monetary and temporal altruism contexts. Studies 2a ($N = 313$) and 2b ($N = 377$) employed a manipulating-of-mediating-as-a-moderator design to further test these causal relationships. Study 3 ($N = 295$) and Study 4 ($N = 704$) then examine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observers' trait and state self-uncertainty, respectively. Finally, Study 5 ($N = 1,798$) conducted an internal meta-analysis across all experiments, which provided robust validation of the overall model.

Consistent with our hypotheses, we present converging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following propositions: (1) Highly altruistic behavior, compared to moderately altruistic behavior, consistently received lower moral

evaluations, both for the behavior itself and for the actor; (2) Perceived teaching function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truism degree and moral evaluation, with highly altruistic behavior diminishing the perception of teaching function and consequently reducing moral evaluation; (3) Observers' self-uncertaint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ltruism degree and perceived teaching function, such that high self-uncertainty exacerbated the perception of reduced teaching function for highly altruistic behavior, whereas low self-uncertainty attenuated this effect; (4) The internal meta-analysis substantiated the robustness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altruism degree, perceived teaching function, and moral evaluation across both monetary and temporal altruism contexts.

Our findings offer several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1) The study provides novel empirical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societal perspective of altruism, demonstrating that moral evaluations are not only determined by altruistic intent but also shaped by social expectations, which consequently leads to lower evaluations of highly altruistic behavior; (2) The study identifies perceived teaching function as a critical mediato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truism degree and moral evaluation, which underscores the active role of individuals in shaping social norms through their moral judgments; (3) The study reveal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elf-uncertainty, which illustrates the dynamic interplay betwee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external social environments in shaping moral evaluations of altruism. These findings offer new avenu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ities of altruism and moral evaluation, suggesting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plore these nuanced relationships across diverse contexts and behavioral domains.

Keywords altruistic behavior, moral evaluation, teaching function, self-uncertainty

附录

研究 1a 利他情境材料

某天, X 购买了一张商场的抽奖券。该抽奖券中奖了, 按照规则 X 可以单独获得 1000 元。

X 去兑奖的时候, 商场管理部门告诉 X, 由于抽奖程序问题误抽了两个中奖者, 即该奖金现在同时有两位中奖者, 商场管理部门希望 X 能够帮助他们决定如何与另一个中奖者分配奖金。

鉴于 X 是先来兑奖的人, 商场管理部门告诉 X 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如何分配奖金。

另一个中奖者无法拒绝 X 的决定, 也没有商量的余地。

X 和另一个中奖者是陌生人, 他们彼此不可能知道对方的信息, 商场管理部门也承诺对个人信息保护。

中度利他组接下里会阅读到: X 分配了奖金, 把奖金的一半, 即 500 元给了另一个中奖者, 自己留下了 500 元。

高度利他组接下里会阅读到: X 分配了奖金, 把奖金的全部, 即 1000 元都给了另一个中奖者, 自己没有留下奖金。

注意力检测: 要求被试回答主人公 X 分配了多少金额。

研究 1b 利他情境材料

X 参加了某网络志愿者活动, 本活动全程在线上进行。

这周任务原本并非由 X 负责, 但是主办方告知 X, 由于一些突发事件, 任务量增加。主办方希望 X 能和另一位志愿者两人共同完成这些任务。

任务是文稿校对任务, 内容非常复杂繁琐且枯燥乏味, 单人完成需要好几天的时间。完成任务没有任何酬劳或奖励。

鉴于主办方和 X 先取得了联系, 主办方希望 X 帮助他们决定如何与另一个志愿者分配任务, 即 X 有权决定如何分配任务。

另一个志愿者无法拒绝 X 的分配, 也没有商量的余地。

X 和另一个任务参与者是陌生人, 他们彼此不可能知道对方的信息, 主办方承诺会对志愿者的个人信息保密。

中度利他组接下里会阅读到: X 分配了任务, X 选择完成一半的任务, 将另一半任务分配给了另一个志愿者。

高度利他组接下里会阅读到: X 分配了任务, X 选择完成全部的任务, 没有将任务分配给另一个志愿者。

注意力检测: 要求被试回答主人公 X 分配了多少任务量。

研究 2a 利他情境材料

某天, X 购买了一张商场的抽奖券。该抽奖券中奖了, 按照规则 X 可以单独获得 1000 元。X 去兑奖的时候, 商场管理部门告诉 X, 由于抽奖程序的问题, 现在抽中了两个中奖者, 即该奖金现在同时有两位中奖者, 商场管理部门希望 X 能够帮助他们决定如何与另一个中奖者分配奖金。鉴于 X 是先来兑奖的人, 商场管理部门告诉 X 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如何分配奖金。商场管理部门补充, 由于是抽奖程序的原因而导致出现另一位中奖者, 因此, 即使 X 选择拿走全部的奖金也完全没有问题。另一个中奖者无法拒绝 X 的决定, 也没有商量的余地。X 和另一个中奖者是陌生人, 他们彼此不可能知道对方的信息, 商场管理部门也承诺对个人信息保护。

中度利他组接下里会阅读到: X 分配了奖金, 把 500 元给了另一个中奖者, 自己领走了 500 元奖金。

高度利他组接下里会阅读到: X 分配了奖金, 把 1000 元都给了另一个中奖者, 自己没有领走任何奖金。

注意力检测: 要求被试回答主人公 X 分配了多少金额。

研究 2a 教化功能操纵

低教化功能组: 根据你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 你知道, 只要 X 分享了奖金, 无论 X 实际给另一人分配多少, 人们都会觉得 X 轻易放弃了自己的利益, 纵容了主办方的错误, 对不合理的规则缺乏必要地质疑, X 的方案是盲目顺从和委曲求全的表现, 等等。进一步考虑, 你觉得 X 的方案是一种糟糕的示范, 具有非常消极的社会价值导向, 会给社会风气带来负面的影响。你不希望人们学习 X 的做法, 你不愿意宣传和推广 X 的做法, 你觉得 X 的行为不可以给人们提供指导和参考, 不应该影响人们以后的行为。

根据上述语料, 无论 X 给另一人分配多少, 你都觉得 X 的方案透着消极的社会价值导向, 你不希望人们学习和效仿, 请对此进行扩写, 不少于 50 字。

高教化功能组: 根据你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 你知道, 只要 X 分享了奖金, 无论 X 实际给另一人分配多少, 人们都会觉得 X 慎重考虑了另一人的利益, 体谅了主办方的难处, 对突发的情况能够妥善地处理, X 的方案是主动合作和维护和谐的表现, 等等。进一步考虑, 你觉得 X 的方案是一种良好的示范, 具有非常积极的

社会价值导向,会给社会风气带来正面的影响。你希望人们学习 X 的做法,你愿意宣传和推广 X 的做法,你觉得 X 的行为可以给人们提供指导和参考,应该影响人们以后的行为。

根据上述语料,无论 X 给另一人分配多少,你都觉得 X 的方案透着积极的社会价值导向,你希望人们学习和效仿,请对此进行扩写,不少于 50 字。

控制组:没有任何附加陈述。

研究 2b 利他情境材料

某天, X 因故被派遣参与某任务的抽选。如果被选中,则要求无偿地为某组织校对文稿。该任务将持续好几天,全程在线上进行,需要人工校对大量文稿,整个流程比较枯燥。按照最初的结果,主办方抽中了另一人完成该任务,没有抽中 X。然而,在任务正式开始前,主办方告知 X,可能是系统程序问题,导致 X 被额外抽到了,即现在该任务中同时有 X 和另一人。主办方和 X 先取得了联系,主办方希望 X 帮助他们决定如何与另一人分配任务时间,即 X 可以选择承担任意天数的任务,剩下的时间由另一人承担。主办方补充,由于情况特殊, X 可能是因为程序问题而被额外抽中,因此,原则上即使 X 让另一人承担全部的时间也合情合理,无论 X 选择多少天都是对另一人份外的帮助。另一人无法拒绝 X 的分配,也没有商量的余地。X 和另一人是陌生人,他们彼此不可能知道对方的信息,同时主办方承诺会对个人信息保密。

中度利他组接下里会阅读到: X 分配了任务时间, X 选择承担一半的任务时间,将另一半任务时间分配给了另一人。

高度利他组接下里会阅读到: X 分配了任务时间, X 选择承担全部的任务时间,没有将任务时间分配给另一人。

注意力检测:要求被试回答主人公 X 分配了多少任务时间。

研究 2b 教化功能操纵

低教化功能组:根据你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你知道,只要 X 接受了额外的任务,无论 X 实际接受多少,人们都会觉得: X 多余地加重了自己的责任,纵容了主办方的错误,对不合理的规则缺乏必要地质疑, X 的方案是盲目顺从和委曲求全的表现,等等。进一步考虑,你觉得 X 的方案是一种糟糕的示范,具有非常消极的社会价值导向,会给社会风气带来负面的影响。你不希望人们学习 X 的做法,你不愿意宣传和推广 X 的做法,你觉得 X 的行为不可以给人们提供指导和参考,不应该影响人

们以后的行为。

根据上述语料,无论 X 实际接受多少,你都觉得 X 的方案透着消极的社会价值导向,你不希望人们学习和效仿,请对此进行扩写,不少于 50 字。

高教化功能组:根据你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你知道,只要 X 接受了额外的任务,无论 X 实际接受多少,人们都会觉得: X 慎重地考虑了另一人的困难,体谅了主办方的难处,对突发的情况能够妥善地处理, X 的方案是主动合作和维护和谐的表现,等等。进一步考虑,你觉得 X 的方案是一种良好的示范,具有非常积极的社会价值导向,会给社会风气带来正面的影响。你希望人们学习 X 的做法,你愿意宣传和推广 X 的做法,你觉得 X 的行为可以给人们提供指导和参考,应该影响人们以后的行为。

根据上述语料,无论 X 实际接受多少,你都觉得 X 的方案透着积极的社会价值导向,你希望人们学习和效仿,请对此进行扩写,不少于 50 字。

控制组:没有任何附加陈述。

研究 4 自我不确定性操纵

自我不确定性启动组:请你花费几分钟想一想,在你的生活中,哪些方面会让你对自己有不确定感。

当你想起这些方面时,会令你感到忧虑、紧张和不安,你觉得非常迷茫。你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被动摇,你對自己充满怀疑,你觉得世界充满未知,你不知道如何向别人描述你是谁,你不知道世界会如何回应你,你充满了不确定感。

它们可以是但不限于你的自我认知、人际关系(亲人、爱人、朋友等)、社会身份地位、未来、物质条件、精神满足、能力、职业、爱好或某段经历等等。

请选择其中两个方面,尽可能地回忆或想象这种自我不确定的体验,并具体和详细地描述(不少于 100 字)。

自我确定性启动组:请你花费几分钟想一想,在你的生活中,哪些方面会让你对自己有确定感。

当你想起这些方面时,会令你感到放松、安心和从容,你觉得非常笃定,你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得到肯定,你對自己充满信心,你对世界有充足了解,你知道如何向别人描述你是谁,你知道世界会如何回应你,你充满了确定感。

它们可以是但不限于你的自我认知、人际关系(亲人、爱人、朋友等)、社会身份地位、未来、物质条件、精神满足、能力、职业、爱好或某段经历等等。

请选择其中两个方面,尽可能地回忆或想象这种自我确定的体验,并具体和详细地描述(不少于 100 字)。

行为道德性评价

阅读材料之后, 请回答你对主人公 X 的行为的真实感受:

题目	极其低	非常低	有点低	不确定	有点高	非常高	极其高
1. 你觉得 X 的行为做得对的程度	1	2	3	4	5	6	7
2. 你觉得 X 的行为的道德程度	1	2	3	4	5	6	7
3. 你觉得 X 的行为应受到表扬的程度	1	2	3	4	5	6	7

道德品质感知(研究 1a、2a、3)

阅读材料之后, 请回答你对主人公 X 的真实感受:

题目	极其低	非常低	有点低	不确定	有点高	非常高	极其高
1. 你觉得 X 的真诚程度	1	2	3	4	5	6	7
2. 你觉得 X 的公正程度	1	2	3	4	5	6	7
3. 你觉得 X 的道德程度	1	2	3	4	5	6	7
4. 你觉得 X 的稳重程度	1	2	3	4	5	6	7
5. 你觉得 X 的节俭程度	1	2	3	4	5	6	7

道德品质感知(研究 1b、2b、4)

阅读材料之后, 请回答你对主人公 X 的真实感受:

题目	极其低	非常低	有点低	不确定	有点高	非常高	极其高
1. 你觉得 X 的诚实程度	1	2	3	4	5	6	7
2. 你觉得 X 的公正程度	1	2	3	4	5	6	7
3. 你觉得 X 的道德程度	1	2	3	4	5	6	7
4. 你觉得 X 的善意程度	1	2	3	4	5	6	7
5. 你觉得 X 的善良程度	1	2	3	4	5	6	7
6. 你觉得 X 的宽容程度	1	2	3	4	5	6	7
7. 你觉得 X 有同情心的程度	1	2	3	4	5	6	7

教化功能感知(研究 1a、1b、2a、2b、3)

阅读材料之后, 请回答你对主人公 X 的真实感受:

题目	极其低	非常低	有点低	不确定	有点高	非常高	极其高
1. 你认为人们可以学习 X 的行为	1	2	3	4	5	6	7
2. 你认为 X 的行为给人们提供了日后行事的准则	1	2	3	4	5	6	7
3. 你会参考 X 的行为告诉别人该怎么做	1	2	3	4	5	6	7
4. 你认为 X 的行为应该影响人们以后在社会上的做法	1	2	3	4	5	6	7

教化功能感知(研究 4)

阅读材料之后, 请回答你对主人公 X 的真实感受:

题目	极其不应该	非常不应该	比较不应该	有点不应该	一般	有点应该	比较应该	非常应该	极其应该
1. 你是否认为他人应该学习 X 的行为?	1	2	3	4	5	6	7	8	9
2. X 的行为是否应该作为他人日后行为的规则?	1	2	3	4	5	6	7	8	9
3. 你觉得是否应该用 X 的行为教导他人要怎么做?	1	2	3	4	5	6	7	8	9
4. X 的行为是否应该影响他人未来社会交往时的做法?	1	2	3	4	5	6	7	8	9

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

阅读材料之后, 请回答你对主人公 X 的真实感受:

题目	非常 不符合	有点 不符合	偶尔 不符合	不确定	偶尔 符合	有点 符合	非常 符合
1. 我对自己的看法常常会相互矛盾。	1	2	3	4	5	6	7
2. 我对于自己的看法可能今天一种, 明天又是另外一种。	1	2	3	4	5	6	7
3. 我会花很多事件疑惑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	2	3	4	5	6	7
4. 有时候我觉得我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真正的我。	1	2	3	4	5	6	7
5. 当我回想过去的自己时, 我其实不是很确定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1	2	3	4	5	6	7
6. 我很少感觉到自己不同人格方面的相互冲突。	1	2	3	4	5	6	7
7. 有时候我觉得我对别人的了解多于对自己的了解。	1	2	3	4	5	6	7
8. 我对于我自己的看法常常改变。	1	2	3	4	5	6	7
9. 如果有人要我描述我的个性, 我可能每天的说法都不一样。	1	2	3	4	5	6	7
10. 即使我想跟别人说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也觉得很难说。	1	2	3	4	5	6	7
11. 一般来说, 我对于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有很清楚的认识。	1	2	3	4	5	6	7
12. 让我决定事情通常很难, 因为我不太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1	2	3	4	5	6	7